

Global Media Journal

全球传媒学刊(IX)

《全球传媒学刊》编辑部

主 编： 郭镇之

本辑特邀主编： 郭镇之 陈昌凤

副 主 编： 周庆安 卢嘉

编 辑 部 主 任： 曹书乐

编 辑 部 副 主 任： 戴佳 李红霞

编者的话

在互联网时代，为了提高时效性，从2012年起，我们的电子学术杂志《全球传媒学刊》从半年一期，改为每个季度出版一期。学刊频次的增加有利于我们与读者的约会。电子学刊出版的稿件经过精选，年末将发表于合订的印刷版上。

包含特定封面主题的一期刊物，仍然设立特邀主编。2011年11月初，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威海召开了“外国记者·媒体与近现代中国”国际论坛，本期封面专题便来自这次论坛的主题。本期“外国传媒与近现代中国”**封面主题**栏目的特邀主编是郭镇之、陈昌凤，发表的论文有三篇：一篇是陈开和的“1949年以来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演变”，其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国记者管理的制度变迁。周怡、董文娜的“英租时期的《威海卫琴报》”是一篇介绍历史上威海地区有影响的地方外报的论文。张培、王薇的论文“1917-1941：《密勒氏评论报》‘涉华报道’理念探究”对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密勒氏评论报》在一段时期内报道中国的思想观念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梳理。他们的论文既有外国经验，又有中国观点，展现了全球视野。

本期的**全球传媒论坛**发表的两篇稿件来自两位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任教的美国记者与新闻学者在威海国际论坛上的发言。詹姆斯·布雷纳（James Breiner）介绍了透过复杂多棱镜解读新中国的若干美国记者的观点。约瑟夫·韦伯（Joseph Weber）教授则现身说法，以亲身感受说明驻中国的外国记者最喜欢报道的一些新闻类型和题材。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新闻传播。

本期特约是用来发表推荐文章的栏目。本期采用的是加拿大学者肖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写作、武汉大学纪莉翻译的“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限制、挑战与机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示了研究的多重视角（包括学界争议），以及对中环境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知识背景是国内学者所不熟悉的。

本期还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奈仁·奇蒂与清华大学博士生董乐铄合作的对中国与印度关系的研究。文章认为，一个全新的亚洲国际传播应该非常关注中印之间的信息流通，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印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文章提出一种中印两国合作关系全面升级的特殊战略——创造一个共享的互信和谐空间。

《全球传媒学刊》在探索中慢慢前进。我们期待学界的关注与批评。

郭镇之

全球传媒学刊(电子刊)第九期
2012年3月出刊

目录

特邀主编 郭镇之 陈昌凤

编者的话

封面主题:外国记者和媒体与近现代中国

1. 1949年以来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演变 陈开和
2. 英租时期的《威海卫琴报》 周怡 董文娜
3. 1917-1941:《密勒氏评论报》“涉华报道”理念探究 张培 王薇

全球传媒论坛

4. 透过美国记者的多棱镜解读新中国 (美)詹姆斯·布雷纳
5. 作为身处中国的外国记者,我最想做的五类报道 (美)约瑟夫·韦伯

本期特约

6. 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限制、挑战与机遇 (加)肖恩·冈斯特

全球传播研究

7. 中国与印度——合作系统化升级的案例 (澳)奈仁·奇蒂 (中)董乐铄

封面主题：外国记者和媒体与近现代中国

1949年以来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演变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Foreign Journalists since 1949

陈开和^①

中文摘要：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外新闻交流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中国国内政策和中外关系的起伏，外国记者在中外新闻交流中的地位和角色也有所不同。本文着重分析了1949年以来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和理念的演变。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日益完善，也逐渐走向更大的开放和包容，这为中外新闻交流的建设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驻华记者，新闻交流，记者管理

Abstract: Foreign Journalists in China play crucial role in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lthough their actual position and status fluctuates with the general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China. The article puts emphasi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foreign journalists since 1949, the year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t concludes that alo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overall exchang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hina's policy towards foreign journalist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open and flexible, which in turn provides good basis for more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Key Words: foreign journalists in China, journalistic exchanges, policy toward journalists

^① 陈开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外传播与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项目批准号08BXW019）的成果之一。

外国新闻媒介进入中国的历史,如果以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为开端,至今已有近二百年。这二百年中,一批又一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中不乏神通广大之士,在战乱和动荡的中国大显身手,许多成为旧中国军阀政要的座上客,有名者如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森(George Ernest Morrison),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支持袁氏不遗余力。为表彰其特殊“贡献”,袁世凯一度下令把北京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里森大街”。抗战期间,代表美国《生活》和《时代》杂志常驻中国的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也曾作为顾问之一,主持过国民党中宣部的对外新闻报道。^①

但从人数上看,解放前外国驻华记者规模还很小。在1937年12月,当时的武汉是中国战时政治中心和对外传播中心,来自全球各地的常驻外国记者也不过40多位。^②至于解放区,因为在经济文化方面一直处于被封锁状态,对外新闻传播困难重重。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才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一部分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向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国家的通讯社和记者基本停止了在华活动。因此,外国驻华记者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和记者,以及西方部分左派政党的党报记者,数量有限。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新闻交流才快速发展起来,驻华外国记者群体规模日益壮大。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各国常驻中国的记者还只有百人左右。而根据外交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共有来自58个国家的421家新闻机构约700名外国记者在华常驻,^③每逢中国国内有重大事件或活动,来华外国记者的数量更是动辄达到上千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注册记者更达到两万人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于来华外国记者的管理,在理念和政策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这些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又存在哪些問題?政策变化的总体趋势为何?本文试图根据现有档案资料和其他公开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建国初期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初步确立

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新闻总署,新闻总署之下设有国际新闻局(China Information Bureau),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国际新闻局的主要业务,除了对外发布新闻稿件以及出版外宣刊物外,还包括管理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国际新闻局局长由乔冠华担任,刘尊棋任副局长,冯亦代任秘书长。^④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中规定:“对于外国记者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一事,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统一办理。各政府机关不得自由对外国记者发布新闻。”^⑤

同时,乔冠华夫人龚澎主持的外交部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下面设有专门的科(60年代后改为处),负责联络和管理外国新闻记者及外国通讯社。新组建的情报司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起草一份关于管理外国记者有关规定的文件。经过反复修改,1952年7月,外交部颁布的《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正式生效,这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和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驻华记者管理制度。此暂行条例共十一条,其中规定:外国记者(包括报社、通讯社、

^① 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13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② 转引自袁本文:《周恩来与西方记者》,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6),69页。

^③ 据外交部新闻司提供的数据。

^④ 甘险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13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290~29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杂志社、新闻摄影社、广播公司之记者)在中国境内执行职务时,应呈请外交部情报司发给外国记者登记证;外国记者请领登记证,应提交所代表之报、社、公司的正式证明文件,代表一个以上报、社、公司之外国记者,应于申请时写明,并只限于向其所代表之报、社、公司发稿;如有违反我国法令行为,或对我国有歪曲事实之报道时,情报司得随时取消其登记证;登记证只能证明外国记者之身份,不得作旅行护照或其他证明之用;对于非外籍而代表外国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新闻摄影社及广播公司之记者,同样适用本条例。^①由此,国际新闻局不再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具体事宜。

由于对外国驻华记者的管理制度刚刚建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因此该条例第十条规定:“本条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在后来的实践中,条例内容确实有所调整,如在1955年的版本中,已经把外国记者的范围扩大到电视台及电影公司,并且明确规定“凡中国公民,一律不得代表外国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新闻摄影社、广播公司、电视台及电影公司为记者”。^②

我国政府对所在国外交政策和相关外国新闻机构的对华态度,是情报司审批外国记者来华的重要依据,并且相应制度了一系列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具体条例,如《外交部情报司关于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记者的初步管理方案》、《资本主义国家记者获准来华后处理办法(内部掌握)》,对于外国记者来华后的接待等做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如“记者入境后,不举行欢迎或欢迎性宴会”,“对批准记者一般不送礼,必要时可由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酌情赠送”,“根据宪法规定,邮电不作检查”等等。^③

对于尚未建交的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在文革”之前,我国采取了比较主动和开放的立场,希望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签订协议,互换记者。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国政府就先后批准了三十九名美国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新闻。由于美国政府的禁令,这三十九名美国记者中,只有三名不顾禁令来到了中国。他们回国以后,又都被吊销了护照。直到1957年8月,美国政府才在美国记者访华一事上有所松动,准许24家新闻单位每家派一人,到中国进行七个月“试行”采访。^④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记者斯诺移居瑞士以后,先后在1960年和1964年重访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接受了长时间的采访,斯诺将采访结果在国外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中日双方则是在1964年4月达成互派记者的协议,同年9月,实现了常驻记者的派遣。但根据协议,双方所派人数各在8名以内。^⑤

二、改革开放与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国外新闻机构纷纷在华设立常驻机构,派驻常驻记者。为加强管理,1981年3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共十四条。国务院的这个规定是对五十年代外交部颁发的《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的进一步完善,在层级上高于后者,对驻华记者的业务开展、工作人员聘请、家属居留等都作了具体规范。根据这个暂行规定,我国对外国新闻机构设立常驻机构、派驻常驻记者实行批准注册制。外国新闻机构要求派遣常驻记者,需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向外交部新闻司办理登记手续。常驻记者

^① 《我外交部颁发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16-00010-01(1)。

^② 《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16-00200-03(1)。

^③ 《关于外国记者来华后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16-00366-01(1)。

^④ 《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声明 就中美互换记者问题驳美国国务院》,载《人民日报》,1960-09-14,第2版;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289~29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⑤ 新华社1964年4月19日北京电。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编:《驻日记者四十年》,556~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于青:《追昔抚今话未来——纪念中日互派记者四十周年座谈会举行》,载《人民日报》2004-09-30,第3版。

的采访活动,要事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才能进行。常驻记者的业务活动不得超出正常的采访报道范围。这个规定没有涉及来华短期采访外国记者的行为规范,也未对外国记者的非法采访行为规定具体处罚办法,仅要求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违法者由中国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根据规定第十三条,“本规定未尽事宜,应当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令和规定办理”。^①

1981年的暂行规定,特别是其中有关外国常驻记者采访活动必须事先申请的规定,成为此后二十多年我国外国记者管理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让很多外国记者产生各种抱怨的主要原因。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规定主要是为了对日益扩大的外国来华常驻记者群体建立制度性规范,并没有很强的限制性意图。“文革”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极力纠正中外新闻交流中的“极左”做法,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交流的宗旨再也不是“推进世界革命”,而是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因此,外国驻华记者受到高度重视和欢迎。举个例子,《日本经济新闻》驻华记者鲛岛敬治在“文革”时期曾以“窃取情报”嫌疑被拘捕下狱,之后又被迫离开中国。1977年我国有关方面就向鲛岛发出访华邀请,在当年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对非常时期发生的事情郑重地向他表示道歉,并希望他继续经常来中国采访。^②1980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负责领导和管理协调整个对外传播工作。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多次强调了“利用外力”的重要性,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怕犯错误的思想,主动见外国人、外国记者”,^③“让他们多接触我国实际”,“帮助他们比较争取地了解 and 报道我国的情况”。^④为此,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之前,中国记协就在八十年代初多次举办外国记者见面会,邀请驻京的外国记者与国内各界人士进行直接见面交流。演艺界一大批知名导演、演员如谢晋、吴天明、郑洞天、刘晓庆、朱时茂等等都参加过与外国记者的影片观摩、交流会。^⑤

从实际效果看,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内的外国驻华记者,他们的对华报道,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Fox Butterfield)在1980年初来华常驻,专门搜集了大量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资料,两年后出版了一本名为《苦海余生》的书,把中国描绘得一片漆黑,却连续两年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连权威学者费正清都颂扬该书是“美国了解中国的里程碑”,“是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基线”。^⑥其对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到了八十年代中,看到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多数外国记者又对中国的改革试验给予积极评价。1986年第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就挑选邓小平为1985年“世界风云人物”,作为封面,并且配发了图文并茂的长篇报道,高度肯定了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社会思潮的动荡,外国驻华记者的违反相关规定的现象逐渐增多,^⑦在1987年10月的拉萨骚乱事件中,达到一个小高潮。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也介入指责我国的新闻管理制度。^⑧但同年10月底的“十三大”上,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1(4),111~112页。

^② 孙东民:《鲛岛先生的中国情》,载《人民日报》,2005-01-24,第3版。

^③ 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191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④ 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222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⑤ 陈有为、郭伟成:《中国影星会见外国记者》,载《人民日报》,1980-12-29,第6版;《外国记者、专家对影片〈邻居〉的反映》,载《电影》,1982(3),16页。

^⑥ 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48页,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Fox Butterfield.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 Times Syndicates, 1982.

^⑦ 新华社天津1月25日电:《向外国记者提供情报 天津大学学生林杰被逮捕》,载《人民日报》,1987-01-26,第4版。

^⑧ 新华社拉萨10月8日电:《违反规定擅自来西藏采访报道 一些外国记者被限期离开西藏》,载《人民日报》,1987-10-09,第4版;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就我国西藏外办要求外国记者限期离藏一事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87-10-10,第4版。

记采访的230多名外国记者普遍对大会的新闻开放措施感到满意。^①

三、1990年条例的出台及其实施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那段特殊时期里,北京市对外国驻华记者采取了严格的临时限制措施。根据1989年5月20日颁发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在戒严期间,对记者采访特作如下规定:一、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宣传报道;二、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相等活动;三、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予以制止。”^②这一时期,西方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失实报道,谣言满天飞。驻华记者的违规操作之风更是屡禁不止。^③许多西方记者一方面拼命捕捉中国国内任何一点“不稳定的迹象”,甚至借机挑唆起哄,试图制造事端并加以无限放大;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中国政府充满了不信任感,时常抱怨被“监视”、“骚扰”,双方互信跌入谷底,外国驻华记者的非法窃密等活动日趋严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1月19日,中国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二十三条。《条例》对外国新闻机构在华设立常驻新闻机构和派遣常驻记者的手续及在中国境内采访活动的审批手续作了详细规定。《条例》规定,来华进行短期采访的外国记者在中境内的采访活动“均须履行申请批准程序”,且必须“由接待单位负责安排、提供协助”。《条例》还明确规定了对于非法采访活动的处罚办法。对于违反《条例》规定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外交部新闻司可以视其情节,予以警告、暂停或者停止其业务活动、吊销《外国记者证》或者《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对于不具有记者身份的外国人擅自在中国境内进行采访报道活动的,由中国公安机关视情节予以相应处罚。^④

总体上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1990年颁布的《条例》对外国记者及新闻机构的驻华采访活动,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庸讳言,《条例》的许多规定与正当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外国记者所需要的时效性和灵活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根据《条例》,外国记者赴国内各地采访,都需要履行审批手续,一旦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发生,完成审批手续之后再赴现场,新闻的时效性就要打上折扣,这也导致了許多事实上的违规操作行为。

1990年《条例》的出台有其独特的时空背景,但它并不没有改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的加强国际新闻交流的基本方针。相反,1990年以后,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交流被摆到了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1990年11月24日,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专门同外交部新闻司、中国记协负责人座谈,主题就是要“做好外国记者工作”,要求在对常驻记者依法加强管理的同时,要“跟他们多接触,多交往”,要“改进现有新闻发言人工作”,中央领导也可以“采取多种灵活形式见外国记者”。^⑤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对外宣传的着眼点应主要放在争取国外最广大的中间群众上,同时要做好国外上层人士或接近决策层人士的工作。^⑥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为统筹协调全国外宣工作的综合性机构正式挂牌成立。

1990年《条例》出台以后,中外新闻交流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其中有部分西方媒体对

^①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徐耀中):《中外记者采访十三大热烈交谈感受 中国变得更开明更有信心了》,载《人民日报》,1987-11-02,第3版。

^②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陈希同市长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令》,载《人民日报》,1989-05-21,第1版。

^③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两外国记者违反北京市府令受到警告》,载《人民日报》,1989-06-02,第2版。

^④ 《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0(2),45-46页。

^⑤ 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281-282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⑥ 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46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华敌意难消所带来的深沉无奈,也有促成中西真诚沟通之后的由衷喜悦,它们共同为我国国际新闻交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积累了实践方面的基础经验。

1990年秋天,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共6578人参加了此次体育盛会,采访此次亚运会的各国各地区的记者有2400多名。本届亚运会首创了联络员制度。131名来自我国的许多机关、团体的优秀联络员,热诚地协助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活动,他们的工作受到外国记者的高度肯定。当时就有外国记者表示,将来如果中国承办奥运会,希望能继续实行联络员制度。^①当时还有一支由数万名大学生组成的服务大军,奔忙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各新闻中心、比赛场馆。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在国内外反响强烈,被认为是我国外宣工作上打了一个“翻身仗”。^②

然而,许多西方媒体对华偏见并不能很快消除。随后的两三年,外国驻华记者与我国有关部门摩擦不断。^③1995年我国承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期间,很多外国记者充分地释放了他们对华的怨气和敌意。这次大会是中国历史上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来自197个国家的实际与会者共4.7万人左右,相当于前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与会者总和的一半。他们来到北京,围绕着“平等·发展·和平”的大会主旨,就有关妇女的各种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进行了3000多场讨论和报告,最后,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联合国官员对中国承办的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组织和服务工作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会议期间,来自境外的采访记者有3100人。许多西方记者不放过任何负面的细枝末节,连一个帐篷被风刮倒都可以做成很大的新闻,几个“藏独”分子在会议期间的活动更是被巨细无遗地大幅报道,而发展中国家妇女们在各种论坛上的精彩观点则根本不在他们的报道视线之内。这种明显的偏颇,遭到了多数与会人员的公开谴责。连美国新闻界也有人看不下去。《今日美国》的创办人、美国自由论坛基金会的董事长阿伦·纽哈斯也在会议期间批评说,美国媒介对中国“有点过分严厉”,美国媒介“应当消除他们那种玩世不恭”。^④

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开放国际新闻交流的轨道。1998年2月,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调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位科学家出身的外宣主管,深知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国际上一些人士“冷战”思维对于中西沟通所带来的困难。他上任不久就强调,向世界说明中国,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外,各国新闻机构发挥的沟通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仅欢迎更多的外国记者来华访问,对于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也将给予更多的服务。”^⑤同年6月底,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随团采访的美国记者有375人,比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87名随团记者人数多了好几倍。29日下午,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国外媒体好评如潮。

进入新世纪,外国在华记者规模不断扩大,外国媒体对华报道数量大幅增加。虽然其中不乏误解和偏见,但总体上,是变得更加全面和平衡。他们更多地采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仅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也关注中国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这对于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无疑是重要的。经过多年的磨合,外国记者与我国主管部门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也在逐步增强。2000年北京市政府在确定“申奥”口号时所征求的外国专家意见中,就包括了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等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⑥

^① 李北大:《联络员—记者的好帮手》,载《人民日报》,1990-10-03,第3版。

^② 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262~263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③ 徐光春、张宝瑞、李京华:《树欲静而风不止——看六月四日前后少数外国人的表演》,载《人民日报》,1991-06-10,第4版;热冰:《两名外国记者窃密案始末》,载《瞭望》,1993(8),24~25页。

^④ 熊蕾:《较量之后的思考》,辑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世妇会中外新闻实录研究》,32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⑤ 李新彦、杨明方:《向世界说明中国——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载《人民日报》,1998-09-03,第5版。

^⑥ 孙静惟,《“新北京新奥运”是怎样提出来的?》,载《大公报》(香港),2001-07-15。

四、北京奥运会与我国驻华记者管理的新阶段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国际新闻交流的一个新的转折。奥运是国际体育界的一场盛会,更是国际新闻界的一场盛会,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最好契机。与此同时,申奥成功,意味着我国奥运期间的记者管理制度要符合奥运会的惯例。正如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所说:媒体是一届成功奥运会的裁判;外国媒体比任何其他媒体更能衡量奥运会的成功。^①因此,对于1990年的《条例》进行调整,就是非常必要而且自然的事了。

200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北京奥运会2006年世界转播商大会上致辞时,对国内外电视机构代表透露,中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将充分考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惯例,并根据我国政府在申办时期所做的承诺,为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报道活动提供便利。^②同年11月,国务院公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简称《规定》),自2007年元旦起施行,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这个规定共九条。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第六条:“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也就是说,持有效签证来华的外国记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不再需要有中国国内的接待单位,他们赴地方采访不再需要中国国内外事部门的批准。他们在华采访报道的工作环境大大地开放和便利了。

随后,在2007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外国驻华记者全面地体验了奥运《规定》带来的采访便利。他们不但可以通过新闻中心联系采访对象,也可以自己直接联系代表团和代表。为了方便记者采访,新闻中心首次在其网页上公布了各个代表团的驻地信息。^③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来自海外的两万多名注册记者和数千名非注册记者,向世界发出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奥运和中国的报道,其中难免有消极的部分,但整体上,外国记者普遍对我国作为东道主所呈现的这场体育和文化盛宴以及我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予以高度评价。比起1995年“世妇会”的报道,外国媒体上所呈现的中国景象,已经有着天壤之别。报道过十二届奥运会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资深记者阿尔·普利泽比尔科夫斯基就总结说,“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堪称完美”。^④

就在奥运《规定》即将期满之际,2008年10月17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新条例共23条。它延续了奥运《规定》中的开放制度,同时保留了1990年《条例》中关于外国新闻机构在华派驻记者的一些程序性规定。它比奥运《规定》和1990年的《条例》更加全面。从此,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自由度大大地增加了。国际新闻界对此都给予积极评价。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奖评委会原主席西摩·托平说,取消对外国记者的限制表现了中国的进步,“中国应该包容地接受外界的评价,不论是褒奖,还是批评。这正能显示中国的自信。”^⑤

^① 闻昊:《媒体运行与筹办奥运》,载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网站“传媒动态”栏目,2008-11-03。

^② 王建新:《刘淇在北京奥运会2006年世界转播商大会上说: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惯例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便利》,载《人民日报》,2006-08-11,第12版。

^③ 易凌、程义峰、崔清新:《外国记者两会“试水”中国媒体开放新政》,载新华网,2007-03-01。

^④ 娄琛、谭晶晶:《外国记者盛赞北京奥运会“前所未有”铭记中国人民热情》,载新华网,2008-08-24。

^⑤ 杨博:《王晨: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体现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载新华网,2008-10-18。

五、小结

综观 1949 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在不同阶段具体的管理政策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包容和开放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面对中国从百废待兴到日益强大的发展变化，外国记者同样需要经历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特雷尔所分析，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和评论之所以“经常流露出愤慨和敌意”，其原因在于“西方不能再真正控制中国的命运的某一重要方面。这一事实使常驻中国的许多西方记者痛心疾首。社会学家称这种情结为‘地位丧失综合症’”。^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会更多了解和理解中国发生的变化，更多地以平实客观的态度而非居高临下的俯视眼光来报道中国。尽管由于中西方文化和新闻价值观的差异，我们很难指望外国记者完全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报道中国和“塑造”中国形象，但我们相信包括西方记者在内的多数外国记者是敬业的，正如一位法国记者所说，“我不会给你们做宣传，但我会客观、真实报道我的所见所闻。”^②而开放包容的管理政策，对于帮助他们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对于促进建设性的中外新闻交流，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 [美] 罗伯特·特雷尔：《我眼中的西方驻华记者》，载《对外大传播》，1997（5），28~29页。

^② 瘦马：《“洋记者”在中国》，载《记者观察》，2002（9），41页。

封面主题：外国记者和媒体与近现代中国

英租时期的《威海卫琴报》

周怡 董文娜^①

摘要：1900年，英国人在威海创办英文报纸《威海卫琴报》，开启了威海的报业史。该报是一份面向驻威海英国人发行的社区报，主要栏目有最新电文、本地消息、社论、副刊、广告等，最具特色的内容是关于英国军人和侨民社区活动的报道，以及富有生活气息的服务性广告。可以看出，英国人在威海立足未稳的非常时期，《琴报》成为连接驻威英国人关系的情感纽带，也是通向外界的信息桥梁。《琴报》停刊之后，《威海卫公报》于1901年创刊，推测是《琴报》的延续，但已经从社区报转换为政府行政报。

关键词：英租威海卫，《威海卫琴报》，社区报

Abstract: The newspaper history of Weihai started from *The Weihaiwei Lyre*, the English community newspaper targeting the British people living in British leased territory Weihaiwei. *The Weihaiwei Lyre* had the latest telegraph, local news story, editorial, supplementary and advertisement. As its distinguished feature, it reported on British military events and emigrants' community activities as well as published service-oriented advertisements. *The Weihaiwei Lyre* had become the emotional link and the bridge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among the British people living in Weihaiwei at the very period when the British started its rule in Weihaiwei. After *The Weihaiwei Lyre* stopped publication, *The Weihaiwei Gazette* presumably the successor of *Lyre*, was founded, however a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ve paper instead.

Key Words: British leased territory Weihaiwei, *The Weihaiwei Lyre*, community newspaper

山东新闻史始于沿海城市，最早是1894年英国人在烟台创办的英文报纸《芝罘差报》。1897年，德国人在青岛创办德文报纸《德国亚西亚报》。1900年，英国人在威海创办英文报纸《威海卫琴报》(*The Weihaiwei Lyre*)，开启了威海的报业史。

《琴报》创办前后的时段，英国人在威海卫立足未稳，行政长官由驻威海卫的军事长官

^① 周怡，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董文娜，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兼任，政治结构和运行方式有待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军方急需一种媒介来联系驻威海卫的英国人。这是该报创办的直接原因。此外，英国人的办报传统和读报习惯也是《琴报》产生的文化背景。

《威海卫琴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1日出版，报纸版面为16开，单面印刷，字体为印刷体。报纸最上方中间位置有狮子和飞龙组成的徽章图案。下面印有报纸题目“THE WEI-HAI-WEI LYRE”，下方标有“每日出版”、刊数、日期、价格，售价为20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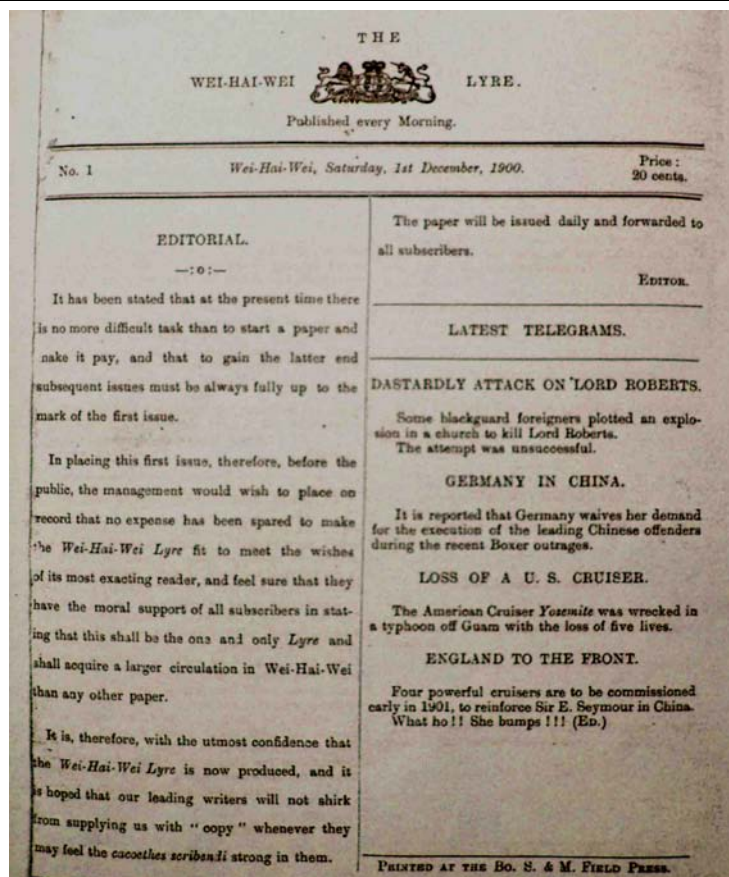
报纸分左右两栏，中间由单线分割开。文章之间用单线分割，有的栏目标题用加粗的黑体强调，有些内容没有标题而仅用线条同其它内容区别开来。报纸栏目有“最新电文”、“本地消息”、“社论”、“藏头诗”、“气象预报”、“广告”以及“笑话”，这些栏目除了“最新电文”以及后来出现的“藏头诗”和“气象预报”较为固定以外，其它栏目都是不定期出版。

《琴报》虽是日报，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周日不出版，每周出6刊。每逢英国人重大节日如圣诞节亦休刊。威海市档案馆自1998年至2004年4次从英国档案馆和沃森大学图书馆取回的报纸复印件，时间截止到1901年3月12日，共有83期。

一、报社地址、人事、资金以及发行方面的考证

根据报纸登载的信息推测，《琴报》社址就在刘公岛的女王大厦。报纸第17期社论提到“没有付费的订阅者，请速到QUINN上将，D.A.A.G办公室，女王大厦（QUEEN'S HOUSE）那里缴费。”第62期社论中，也有关于报社地址的线索，“编辑希望在刘公岛上的Messrs Lavers和Clark办公室与读者进行交流”。根据威海档案馆“关于女王大厦综合服务的报告”记录可知，女王大厦里设有诸多机构，非军事部门的英国官员大多在此办公。报社显然设在其中。女王大厦即北洋海军提督署旧址，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将刘公岛诸多原有建筑重新命名。

编辑人员有Salib、Bridges、Elliot. R. A、Harrison. R. E以及Lavers和Clark，也许是由于人力和财力的限制，报纸实行编辑负责制，编辑负责新闻采集、版面编辑、撰写社论等工作。新闻均无署名，推测报纸的新闻采集主要由编辑、通讯员和热心读者来完成。报纸设有财务人员，社论中多次提醒读者向Quinn上校缴纳订阅费。由此看来，工作人员和编辑可能是驻威英军军官，他们兼职做这样一份工作。



原版《威海卫琴报》



《威海卫琴报》地址——女王大厦，原北洋海军提督署

资金方面，从《琴报》第56期所列举的财务状况看，报纸主要是依靠订阅费维持生存。同时，刊登广告是该报在经营方面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第56期公布的财务状况：1900年12月至1901年1月，报纸净利润达到了210.61美元，截止1901年2月1日，报纸手头资金已达243.80美元。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无法显示英国政府为《琴报》提供任何资金支持。

《琴报》的读者是驻威海卫的英国人。发行方式是读者订阅，送报人送达，没有零售点。如果读者有特殊需要可以去报社零购。报纸信息显示订阅费每月2美元（注：三月份除外，三月份是1美元。），零售每张20美分。发行地区是刘公岛和威海卫码头。据第56期的财务

公布,推测二月份订阅量为101份。^①可见报纸的发行量在100份左右,根据威海卫行政长官署于1921年第二次人口调查记载,当时威海卫常住外侨247人,^②加之舰船往来的流动人口会更多一些。所以《琴报》能有这样的订阅量,是令人满意的。编辑也多次在社论中提到“希望我们的报纸能够发展成为远东最著名的日报”,不管是自我解嘲还是确实怀抱这样的愿望,都传递出了编辑对《威海卫琴报》的珍惜和期待。

二、《琴报》是威海卫英人居住区的社区报

《威海卫琴报》是一份社区报,即为驻威海卫英国人居住区生活服务的报纸。

“社区报”是指以某个或多社区范围内的居民为目标读者群的报纸,即指服务于特定社区、强调其归属性和认同感的报纸。《琴报》社论中多次提到“我们的社区”(our community),所以“社区报”具有更清晰的地域界定和更明确的读者聚焦,主要特征是为某一特定社区居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社区报纸主要刊登各种的社区新闻、服务性信息。即使重大新闻,社区报也会尽可能地寻找与本地居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对社区新闻事件不遗余力的详实报道,是社区报最显著的特征。第3期“本地新闻”报道了英国人在刘公岛女王大厦举行的一次聚会,所有参与者以及每人所扮演的舞会角色,都不厌其烦地介绍,文章结尾还登载了本次聚会的节目单。该报频繁而详细的体育报道也体现出报纸对本社区新闻事件的特别关注。

社区报另一个特征是注重人情味,努力拉近与读者的关系。《琴报》对英国人社区每一位居民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关心。报纸第13期报道一位军官要离开威海卫:

Brown.R.E就要离开威海卫前往香港了,这对于威海卫的音乐是一个损失,因为他有一副美丽的歌喉。此外,他要通过我们的《威海卫琴报》告知读者,希望为他的狗狗找到新的主人。^③

紧接着,第14期报道有位官员来威海卫任职的情况。

Bubbling Wells要来,他的到来会给威海卫增添新的活力,他踢球很棒。另外,他通过《威海卫琴报》告知读者,想要寄养他的小猫。^④

这些新闻显然对于在威海卫的英国人的日常生活极具价值,文字间情意浓浓。为了进一步突出人情味,报纸多次刊登“读者来信”,几乎无所不谈。

天气预报、教堂信息是《威海卫琴报》上更能突出报纸服务性质的栏目,这些都是与本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方便社区居民的出行和生活。

《琴报》第21期社论中提到,“当我们开始创办这份报纸时,我们最大的愿望是避免惹人注目”。一份依靠订阅费生存的报纸,却极力避免“惹人注目”,显然是在表明自己的社区服务立场。同时,编辑也为自己在不经意间声名远扬而深感自豪,该社论叙述一位读者将《威海卫琴报》寄给上海的《北华捷报》,得到赞誉——“印刷精美的报纸”,编辑感到“受宠若惊”并且“重担在肩”。

三、《琴报》的内容构成与新闻报道

《威海卫琴报》的内容由新闻报道、社论、服务性信息、文学作品和广告构成。根据平均抽样方法对该报内容进行统计,在抽取的13期报纸中,新闻报道47条,其中国际报道

^① 根据报纸五十六期公布的财务状况,《威海卫琴报》二月份的订阅总费用是202美元,根据每月2美元的订阅费可以计算出订阅量为202/2=101份

^② 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③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档案号229-1-306。

^④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档案号229-1-306。

34条, 本地报道13条, 社论5条, 服务性信息11条, 文学作品及广告12条。

为了便于考察, 将报纸内容分为两大类: 新闻类文体和非新闻类文体。根据抽取的十三个版页统计, 从所占篇幅比重上看, 新闻类文体约占40%, 非新闻类文体约占60%。

1、新闻报道的主要来源

首先是电报信息, 头版开设“最新电文”栏目刊登这些电报。最典型的是在女王病重以及逝世期间的连续性系列报道, 长达10余期(篇), 其中包括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慰问电全文。包括女王葬礼(48期)、葬礼事宜(51期)、印度对女王的纪念(52期)。“当地消息”特别报道了威海卫的纪念活动(52期)。值得注意的是, 报纸上还登载了爱德华公爵对英国海外殖民地人民的一封信, 信中同样表达了对女王一生功绩的赞誉以及怀念之情。这些电报由《琴报》从上海购买, 除了节假日上海通讯机关休息或天气情况不利通讯之外, 这些电报每天出现在报纸上。

其次, 转载《北华捷报》上的新闻。这些转载的消息并没有固定的栏目, 编辑每次在转载时都加上自己的按语“消息转自《北华捷报》”。

第三、秘密消息来源。报纸上多处提到“秘密消息机构”(Secret Service Agent), 内容涉及威海卫本地消息。其中两处有关轮船到港, 一处有关中国军团, 一处有关官员任命的消息。如:

我们的“秘密消息机构”通知我们意大利二等巡洋舰*Vesurio*昨天到达威海卫。他还告知我们如下绝密细节……^①

报纸第39期, “秘密消息机构”同样透露了一艘军舰到港的消息。对于威海卫这样一个军事基地, 军舰的往来很可能与英国的军事政策相关, 所以人们对这些消息格外重视。

第四、来自读者的供稿、信件。读者参与报纸一直是《琴报》的重要特点, 所以很多读者成为报纸的通讯员, 及时报道一些发生在身边的新闻。一些读者信件也就成为《琴报》的消息来源。如:

经允许, 下面的内容摘自一个官员R.A的来信, 他最近去了北京, 那些想要去中国北方探险的人或许这些内容感兴趣。……^②

该信是威海卫的英国人收到来自北京的官员 R.A 发来的信件, 内容是建议那些想去北京的人最好推迟他们的计划。

2、本地新闻

“本地新闻”这一栏目主要报道威海卫本地消息, 同“最新电文”相比较, 不够稳定, 缺乏连续性。选材涉及到威海卫英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琴报》作为社区报纸的特征。

体育报道是《琴报》“本地新闻”的一大特色, 在可查找的83期报纸中共有20篇比较详细的体育报道, 有足球, 曲棍球、游戏类体育。在这份容量有限的报纸上十分引人注目。

《琴报》首次报道足球比赛是1900年12月26日英国巡洋舰“奥兰多”号水兵与刘公岛海军基地英军警备队在刘公岛联合服务娱乐场举行的一场对抗赛。这是威海现存最早的足球比赛记录, 也是足球运动传入威海的标志。

1900年12月26日, 一场足球比赛将要在联合服务娱乐场举行。英国巡洋舰“奥兰多”号的水兵对阵刘公岛海军基地警备队, 下午2点钟比赛开始。^③

并且详细列出每一位队员的姓名和出场位置。关于足球比赛的过程报道是极其详尽的, 大多属于长篇报道, 可谓绘声绘色, 往往占据版面的一半篇幅。

^①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 档案号229-1-306。

^②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 档案号229-1-306。

^③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 档案号229-1-306。

四、社论、副刊性文字及其它

1、社论

作为《威海卫琴报》的一个固定栏目, 社论所占分量不多。现存的83期报纸中, 社论仅有16期。与通常意义上的社论不同, 《琴报》的社论只是一些节日庆典与礼仪性文字。

明天就是圣诞节, 告知我们的读者后天和大后天报纸将暂停出版。

我们趁此机会祝你们圣诞快乐!

我们希望到下个圣诞节, 中国令人伤心的形势能够改善, 有关威海卫的模糊政策能够确定下来。并且我们这张小报纸能够成长为远东地区著名的日报。怀有这些美好的愿望, 我们谨向我们的读者敬礼。^①

社论之外, 还有一些言论性文章, 写得轻松俏皮, 带有英国小品文的特征:

中国人做事情都是反着的。他们的指南针指向北方而不是南方。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裤子。男人留长发女人却把头发盘起来。裁缝是男人, 女人挑担。口头说的话从来不用来书写, 用来书写的话从来不说。书倒着读, 注解刻在书页上方。白色用在葬礼上, 女傧相穿黑色衣服, 且不由少女担任, 是由丑陋的老妇担当。中国人先说姓。他们打招呼时摆手而不握手。...^②

2、副刊

版面有限的《琴报》上, 副刊性文字占据较大版面, 形式包括藏头诗、诗歌、小说、笑话等, 具有很大的趣味性。

藏头诗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栏目, 对一份新闻采写能力不强而又每天出版的报纸来说, 这样的栏目既可以吸引受众又可以缓解编辑的组稿压力, 所以“藏头诗”栏目从24期至56期, 从不间断。

短篇小说以鬼怪恐怖故事为主, 属于典型的副刊通俗文学。作品善于设置悬念, 渲染气氛, 引人入胜。如《一幢闹鬼的房屋》, 明显继承英国哥特式小说写作传统, 后来上海的施蛰存、徐訏就热衷于这个题材的文学创作, 并在20世纪30年代的报业副刊中形成文学潮流, 被称之为新感觉派的“魔幻小说”。可见, 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 境内外文报的副刊是其一支。

报纸在创办过程中还加入了“笑话”栏目, 这些笑话大多比较短小, 典型的英国式幽默对话, 寥寥数语, 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欢乐。

3、广告

广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栏目, 出现在报纸右下角。严格地讲, 《琴报》的广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广告, 更像是供求信息发布的一个平台。从内容上看, 多涉及拍卖活动、供求等生活信息。

《琴报》第一次提到广告是在第20期, 编辑表明希望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目的是“帮助本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生意兴隆”。但从后来刊登的广告看, 这个初衷并未如愿。而更多的是军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

一系列的物品, 包括一辆自行车, 轮椅, 过滤器, 日本屏风和桌子, 300桶12匝的弹药出售。地点是皇后饭店西北的广场上。卖主是一位将要归国的官员^③

类似的拍卖活动在广告中多次出现:

拍卖会有皮毛, 珠宝, 丝绸等会在下星期二的下午两点半, 在bamsey先生的卖东西的房间里。^④

^①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 档案号229-1-306。

^②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 档案号229-1-306。

^③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 档案号229-1-306。

^④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 档案号229-1-306。

广告中有大量涉及生活方面的内容,并且以极为个人化的方式发布个人信息。

需求——一顶新帽子。为May Street的Mr. Dressta Kyll提供。^①

需求,一个中国厨师,越快越好。为Bay Street的Hon. Sec.R.A.Mess提供。^②

4、服务性信息

《琴报》非常注意服务性信息的发布,如气象报告、航运消息、教堂活动以及生活类服务信息。版面位置不完全固定,大致是在主要内容之后。

气象报告在第30期之后一直作为固定栏目每天出版,主要报告温度和降水量。报纸第63期加入了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这一变化延续到83期结束。

报纸还会不定期地刊登航运信息,为读者提供服务。威海卫当时的交通不够发达,同外界主要联系是靠轮船。以邮政为例,信件从英国到达威海卫要花费40到86天的时间。每周或者每两周载有信件的汽轮从上海到芝罘,威海卫的邮政机构再用轮船将信件从芝罘取回。这就使得报纸上信件到威的信息成为读者的期盼。

教堂信息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栏目,一般在每周六出现。主要涉及教堂的活动内容、时间、地点以及主持人等信息。此外,报纸刊登一些生活常识类的文章。

5、读者来信

《琴报》一向重视读者来信以及编辑的回复。读者来信不仅是报纸与读者互动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且能够从来信内容获得读者信息与新闻线索,从而调整编辑方针。

来信内容多种多样,有的反映问题,希望报纸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有的提出问题,希望编辑给予答复;有的信件表达对报纸不满。编辑对待这些稿件的态度是严肃的,对于反映公共问题的信件通常是来函照登,对于私人问题则是有限发表,合理解答,以保护个人隐私。

报纸重视读者来稿也是为了补充稿件不足,缓解出版压力。编辑不止一次地呼吁读者踊跃参与报纸的出版,“所有寄给编辑的建议、投诉、藏头诗、信件、匿名信等,一旦需要,都会立即见报。”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也弥补了新闻报道的单调和枯燥。

1900年11月9日一封“寻人”信件写得十分感人。编辑命名为《一封悲哀的来信》,是波娜从印度致萨塔拉医院大夫,表达一位妻子对失去联系的丈夫的牵挂和忧虑,并希望得到报纸的帮助。

有的信件提出中英文的翻译问题,说明英军官兵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

敬爱的编辑先生

您和广大的读者是否可以告诉我汉语“威海卫”的正确翻译。许多博学的人对这一短语给出了不同的翻译,我希望通过《威海卫琴报》得到答案。^③

然而,《琴报》这样的军队社区报,也有其特别的军人风度。对于读者非礼的指责,编辑会做出强硬的反击:

我们认为你一定是饮酒过量,眼光偏见。对此,我们强壮的冠军拳击手将私下答复你。^④

《琴报》对读者来信一直看重。来信不仅丰富报纸素材,为编辑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而且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形成互动,对于依靠读者订阅费维持生存的报纸尤为重要。

五、《威海卫琴报》的停刊与《威海卫公报》的创办

威海市档案局从英国取回的《威海卫琴报》复印件截止到1901年3月12日,即报纸第

^①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档案号229-1-306。

^②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档案号229-1-306。

^③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档案号229-1-306。

^④ 威海市档案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档案》,档案号229-1-306。

83期，戛然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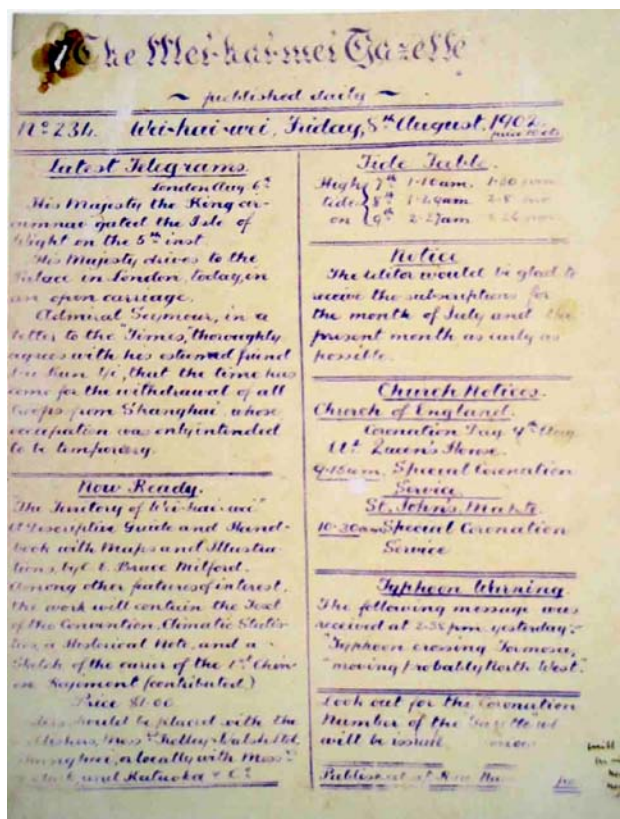
原因之一，印刷厂迁移，被迫停刊。

报纸第54期社论向读者告知“我们很遗憾地通知读者，印刷厂将要向北搬迁，恐怕《威海卫琴报》将要过早的停刊。”报纸第58期，编辑用一首长诗《天鹅之歌》向读者告别，文辞缠绵悱恻，表达了无限的怀恋与伤感。

随后得益于一场暴风雪，封住了威海卫港口，《琴报》因此得以暂时出版。报纸第59期社论中说“我们现在可能利用印刷厂继续出版两到三个星期”。此后报纸果然正常出版，直到1901年3月12日的第83期为止。比较符合编辑提到的“两到三个星期”。

原因之二，《威海卫琴报》改名《威海卫公报》继续出版。

威海档案馆馆藏一份《威海卫公报》，出版时间是1902年8月8日第234期。从报纸形态上看，与《威海卫琴报》很相似。每日出版，版面十六开，单面印刷，左右分栏，中间单线割开，栏目标题用加粗的黑体强调。不同的是，《威海卫公报》是手写体，报头上方只有“THE WEIHAIWEI GAZETTE”（威海卫公报），不再出现狮子和飞龙组成的徽章图案。售价每份10美分。



《威海卫公报》，1902-08-08

《公报》设有“最新电文”，内容是有关英国国内政治动态，“潮汐表”、“通知”、“教堂通知”、“台风预警”以及威海卫租借地简介。在内容上与《琴报》接近。

推测《威海卫琴报》并没有停刊，而是改名《威海卫公报》继续出版下去。而威海市档案局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取档时，将《威海卫琴报》作为一个目录归档，并没有将改名为《威海卫公报》的报纸一并取回。

《公报》1902年8月8日已出版到234期，大致推测第1期应该是1901年11月份，这与《琴报》最后一期，即1901年3月12日，相差近八个月。

仅靠一个页码的《威海卫公报》，很难做出精确的分析，但从名称上看，改名后的报纸更带有官方性质。联系当时英国在威海卫的统治，英国租占威海卫之后，在威海卫成立了临

时行政公署，先后由海军部与陆军部派员管理，1901年转交殖民部。1902年5月，港英政府辅政司兼华民政务司骆克哈特受命任威海卫首任文职行政长官。从时间上，《威海卫琴报》的停刊与威海卫设立正式行政公署比较吻合。骆克哈特到任以后，政府各项工作逐渐规范起来。社区报被政府公报取代。

封面主题: 外国记者和媒体与近现代中国

1917-1941: 《密勒氏评论报》“涉华报道”理念探究

1917-1941: China-related reports philosophy of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张培 王薇^①

摘要:《密勒氏评论报》,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资格最老的一份英文周报;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1928 年来华后供职的第一家媒体;公开发表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首家媒体;报道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红色中国”内幕的首家媒体;因“反日侵华”立场洋主编遭迫害的首家国外媒体;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继续出版的英文报刊。该报自创刊至抗战被停,历经二任编辑,始终秉承“独立客观”的新闻专业理念,对推行美国对华政策、向西方介绍中国、记录中国革命历程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美国的政治意图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互协调。本文的兴趣也正在探究自 1917 年创刊至 1941 年停刊期间,该报报道理念的来源和内容,为了解外报眼中的中国以及探究该报的新闻史价值提供参考。

关键词:《密勒氏评论报》,密勒,鲍威尔,涉华报道

Abstract: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was a weekly journal which was the oldest English American journal published by in Shanghai. A famous journalist called Edgar Snow was employed by this journal when he first came to China in 1928.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in 1927, Snow went to the west China and had an interview with Ma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 that the exclusive news about the socialist China was published by this journal.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J.B. Powell was the first foreign chief editor to be persecuted by Japanese troops and resume publication in 1945 by his son. There were two important chief editors during the 25 years' life of this journal who insisted on the journal reports philosophy such as “Indispensable and Object”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from the

^① 张培,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王薇,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or China, introduction of China, historic records abou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romo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thesis was mainly about the source of this journal's concept and how to interpret it during the history from 1917 to 1941 in order to make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west press and analyze the historic value.

Key word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Thomas F.F. Millard, J.B. Powell, China-related reports.

《密勒氏评论报》，20世纪20年代上海报业中的一个“不起眼儿的小角色”^①，既不如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关系甚好、有洋行雄厚资金支持的老牌外报《字林西报》能左右西方各国对华政策，也比不上上海知名本土商业名报《申报》、《新闻报》历史悠久且受众规模庞大，但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独立精神、同情中国、推介中国、改变中国的自我标榜中，反映着中国社会自军阀混战至新中国成立的种种变迁，记录着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甚至在某些重要关头触动过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美国转变对华态度。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沟通。三十六载，成就虽非卓绝，但也具备了别家外报难以企及的成绩。见证着《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曲折却不俗的新闻足迹：

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资格最老的一份英文周报；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华后供职的第一家媒体；
公开发表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首家媒体；
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红色中国”内幕的首家媒体；
因“反日侵华”立场洋主编遭迫害的首家国外媒体；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继续出版的英文报刊……

同其他外国媒体与记者坎坷甚至不得善终的从业经历一样，《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的新闻历程也算不上平坦。

一、1917-1941：《密勒氏评论报》的两个重要时代

来华外报及其从业者，表面上看来，各有各的目的，一种是冲着在华贸易的利益而来，新闻业不过是为其谋利服务的工具而已；一种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意图而来，来华必定介入中国时局和中国事务，新闻业是其推行政治意图的情报获取机构和推广平台；还有一种是奔着中国文化而来，在其母国就对东方文化甚至中国文化有所研究，有些甚至就具有汉学家的身份；再有就是专门从事新闻业的职业新闻人。当然，所有种类人群的背后，都不可回避其共同的、根本的宗旨，即：通过办报掌握、获取并传播信息，为西方国家推行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服务，进而强化其侵略政策和殖民统治。

自1917年创刊至1941年日军勒令停刊，《密勒氏评论报》历经二位主编密勒与鲍威尔，他们的个人经历、新闻专业理念、政治立场以及对华态度，与该报的发展方向和“涉华报道”立场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任主编鲍威尔所在的时期也将该报领入了黄金时代。

（一）密勒时代：《密勒氏评论报》的创立与办报理念的形成

密勒，毕业于密苏里大学，专业是冶金采矿，但立志从事新闻业，毕业后进入《圣路易斯报》，随后成为《纽约先驱报》的驻外战地记者。义和团时期，被该报派到中国，目睹了八国联军的罪行，并通过报道谴责联军，表现出对中国的同情。1911年在上海创办《大陆报》，打破了英国报业垄断的格局，也结束了外报不关注中国本土事务的办报理念。1915年因不堪与《字林西报》的竞争离开《大陆报》，1917年，创办《密勒氏评论报》。后期，密勒开始介入中国政治事务，因为兴趣的转移，他将《密勒氏评论报》转卖给鲍威尔。1925年，重回新闻业，成为美国《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因反日立场被解雇。1929-1935年间任蒋介石政府顾问，1941年因伤回国，1942年离世。

密勒也是一位美国著名的中国事务专家，十分高产，著作颇丰，这也是他来到中国后将主要兴趣放在中国政治和中国问题上的原因，他后期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驻华盛顿顾问也就

^① 张功臣：《身陷临城劫车案——“洋票”鲍威尔》，《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31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不难理解了。他来华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大陆报》，成为他个人政治立场和对华态度的一个重要的表达渠道，这份从业经历也让他形成了一套在华办外文报刊的经验模式。严格意义上说，《大陆报》是一份大众化的英文报刊，要借此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力图打造《大陆报》成为一份能让西方世界聚焦中国的媒体。该报遵循密勒的亲中立场，消息灵通，报道及时，打破了中国沿海英国报纸的垄断格局。在版面设计方面，改变了头版刊登广告的英式排版模式，直接刊登中国重大事件的新闻。

1917年6月9日，密勒在上海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16开本周刊，逢星期六出版，每期50页左右。办刊方针倾向独立、自由，宗旨是“让远东局势的发展，使本国明了；同时让西方的发展，使东方明了”。该刊的读者主要是在华外籍人士，部分运销欧美，其次为中国政界人士和知识阶层。^①

密勒的政治立场可以总结为：反帝反殖，主张民族独立、平等。多少带有美国的民主共和思想，并希望以此来指导中国事务。他所办的报刊不仅将中国介绍给了西方，还间接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新闻历史的兰德评价密勒时说道：“他试图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切地讲，是促使美国采取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立场。”^②

（二） 鲍威尔时代：《密勒氏评论报》编辑方向的延续与“独立精神”的延展

密勒初创《密勒氏评论报》时，经推荐，鲍威尔成为该报的助理编辑，开启了他在中国长达25年的坎坷新闻从业历程。

1886年，鲍威尔出生在密苏里州，做过报纸的实习记者，后来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读书。毕业后，进过几家当地的小报，当过实习记者、广告部经理和市政专栏编辑，而后回到母校任教。其间，《大陆报》后的密勒希望聘用一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协助他在中国创办一份报纸。经推荐，鲍威尔成了这个最佳人选。1917年1月，他乘坐远洋客轮“日本丸”前往中国，2月初到达上海。当时他立志于通过《密勒氏评论报》，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干出一番事业来。

鲍威尔接替密勒做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之后，延续着密勒在《大陆报》形成的办报理念和模式，也秉持着密勒时期《密勒氏评论报》的办报立场和态度，继续奉行密勒提出的“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的编辑方针，该报设有：“社论”、“特稿”、“一周要闻”、“中国名人录”等栏目。上任不久，他公开发表《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中国是独立国家，不是西欧或东瀛的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他十分重视对新闻业务的探求和改进，首先，改进报纸的编排模式。用不同型号的铅字，美化各个专栏的标题和正文，包括广告。其次，注重对报纸读者分布面的调查。“未来的读者并不限于美国人和英国人，还有其他几千名外国人。……不仅如此，出乎我意料的是，最大的英文读者群却是年青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③此外，他还注重培养读者兴趣，组织了研习时事的俱乐部和班级，塑造潜在受众，也间接扩大了发行量。再次，注重对市场需求的研究与挖掘。在他看来，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不仅有对商业、金融和经济新闻感兴趣的人，还有许多热衷于政治和宗教新闻的人。第四，重视独家新闻的报道。原本定于1917年6月2日出版创刊号，但美国在华法院的一位官员透露内部消息，说罗炳吉法官正在做一项重要决定，如果创刊号推后一个兴起出版，可能会抢到一条好消息，所以《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刊时间成了6月9日。果然，这是有关一项限制组建私营的“美丰银行”的决定，而且法官还特别提出，“极需阻止在华从事商业活动的美国人组建诸如此类的‘松

^① 朱少伟：《〈密勒氏评论报〉见证现代风云》，载《新民晚报》，2009-07-19。

^② 彼得·兰德：《中国通》，24页，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95。转自：[英]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116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

^③ [美]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邢建榕、薛明扬、徐跃译，12~1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散而不负责任的公司’。”^①

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外媒的记者有些选择离开,有些选择留守,鲍威尔就是留守记者中最著名的一个。他秉持反日的立场,在报纸上维护中国独立自主,揭露抨击日本侵华的恶行,也因此招来连连厄运。《时代》周刊就曾指出“……从入侵满洲开始,日本政府就将他列为‘国家头号敌人’”。^②随着日本侵华逐步深入,上海形势不断恶化,很多外报及其从业者遭受迫害,鲍威尔及其《密勒氏评论报》也难逃日本魔掌,正如鲍威尔描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生活现状时所评价的那样,形同于“生活在火山口上”^③。1941年,日军进占租界时,鲍威尔被捕关入集中营,后来美国参战,日本人怕惹麻烦,准予鲍威尔回国,因狱中用刑加之感染重疾,双脚腐烂被迫截肢。归国几年后去世,享年56岁。

纵观《密勒氏评论报》三十六年的历程,从1922年到1941年被日本侵略军查封,鲍威尔执掌该报达19年,这也是《密勒氏评论报》的黄金时期。鲍威尔曾将该报的英文名改为《远东每周评论》,1923年6月又改为《中国每周评论》,但中文名称《密勒氏评论报》始终未变。抗战后,该报由鲍威尔的儿子约翰·威廉·鲍威尔接手,1945年10月恢复创刊,公开支持中共。解放后,因立场和报道被国务院和军方控诉煽动罪、叛国罪或伪证罪,并禁止《密勒氏评论报》邮寄国内发行,该报被迫于1953年6月停刊。^④

二、1917-1941:《密勒氏评论报》“涉华报道”理念的来源

(一)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立场

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它成了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总的指导方针。美国政府一向主张取消英法德等先于它进入中国实施的“治外法权”,企图用“门户开放”政策还中国一个独立自主的面貌,但实质上是希望在中国分得一杯羹。

《密勒氏评论报》创立时,正值一战期间,英、法、德等国因忙于战事而放松了对中国的殖民统治,这就给日、美两国创造了控制中国的机会,美国摆出与中国人民友好的姿态,鼓励中国人民自立、参政,也并非真的希望中国主权独立、民族自强,这只是美国希望借此扼制日本扩张在华势力的权宜之计。这也就为美国在华报刊及其从业者提出了办报的大方向,以其本国的最高利益为上,凡事站在本国政府立场上报道中国事务,为其搜集中国情报,为对华政策提供参考。报刊言论和报道的立场和态度,也要本着维护并践行其国家政府对华政策为根本旨归,既要表现出对中国独立的关切与鼓励,对中华民族遭遇的同情。

“《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民族的同情,源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立场,也决定了在面对中国具体事件的报道立场和态度。”^⑤该报从第二任主编鲍威尔开始就公开声称主张中国独立,要撤销治外法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要不侵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思路和美国政府的利益,那么对中国事务的报道是肯定要站在中国一方。

(二) “密苏里新闻帮”的新闻精神

“密苏里新闻帮”,是美国新闻史学家对上个世纪初一批在远东出没、具有密苏里背景

^① [美]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邢建榕、薛明扬、徐跃译,1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② 《日本头号公敌》,载《时代周刊》,1942-09-07。转自[英]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228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

^③ [英]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188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

^④ 张功臣:《身陷临城劫车案——“洋票”鲍威尔》,《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320~32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⑤ 陈依群:《密勒氏评论报与“上海”问题》,载《社会科学》,1991(12)。

的新闻记者的称谓——尤指那些密苏里大学出身的新闻学子。1928年前密苏里毕业生有47名赴远东工作，其中半数以上都在中国，其中就包括《密勒氏评论报》的密勒、鲍威尔、克劳，以及后来加入的埃德加·斯诺。“密苏里新闻帮”的创始人是出生于密苏里的沃特·威廉，他也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新闻学的倡导者和创始人，1931年就任密苏里大学的校长。此外，他还创立了记者守则，为新闻界的从业者树立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准则和专业目标。主要包括：新闻是一种专业；报纸要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有承载公益的责任；要保持正确与公平并为读者的最大利益服务；坚持超然地位，不为成见和权力的贪欲所动。”这也成为后来“密苏里新闻精神”形成的基础。“密苏里新闻精神”通过一个又一个密苏里人得以在中国报道中彰显，融合了美国精神与新闻专业精神的核心内涵，其一，尊重事实；其二，敢于冒险；其三，具有同情心。^①

《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始人密勒，是“密苏里新闻帮”里最早将“密苏里新闻精神”付诸实践的记者，作为密苏里毕业生中最早来中国的新闻记者，依托其创办的《大陆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以及政府顾问的身份，表达着对中国事务的关心与同情。

鲍威尔、克劳以及斯诺，作为“密苏里新闻帮”的杰出代表，借助自己手中的笔和报纸，如实报道中国事务和重大事件，甚至改变了美国政府以及大多数美国外报不关注中国本土新闻的态度和面貌。在充满战乱、贫瘠，危险重重的中国坚守新闻阵地，尤其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避日军迫害始终坚持反日立场。表现出了希望中国独立，同情中华民族遭遇的态度。

不能否认，《密勒氏评论报》的办报立场和报道态度，以及所表现出的新闻专业理念，深受“密苏里新闻帮”的“密苏里新闻精神”影响，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报道现实中来进而有所发展。

三、1917-1941：《密勒氏评论报》“涉华报道”的理念及其实践

（一）对中华民族表示同情之意而非表达热爱之情

鲍威尔刚接手《密勒氏评论报》，日本人再一次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第五号，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及满洲享有政治、军事、财政等特权。鲍威尔认为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此事并争取其他西方各国的介入，于是他将此事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并借助其他美国报纸扩大此事的影响，还亲自撰文揭露日本对中国强行实施不平等条件等内情，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迫于压力，日本方面竟推说此事为莫须有的谣言，不了了之。

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鲍威尔亲见上海的血腥屠杀，让他重新审视国共两党以及两极政治较量导致的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1929年中苏武装冲突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鲍威尔都在现场，作为目击者报道了这些世界瞩目的大事件，看到中国遭遇的主权领土被野蛮侵犯的现实。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阻止了很多外报和记者深入西部了解与其对峙的中共，《密勒氏评论报》在重重危机中突破封锁派斯诺到了延安，不仅促成了斯诺的延安之行，《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篇章也得以公开发表。1936年11月14日开始连载的《毛泽东访问记》使《密勒氏评论报》成为首度公开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外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红色政权也得以首次见诸报端。而这些，都授意于鲍威尔，得益于他职业新闻人的冒险精神以及独立、客观、尊重事实的专业理念。

作为美国驻华记者，鲍威尔亲眼目睹并见证了中国社会革命历程中的一次又一次遭遇，作为职业新闻记者，他借助报纸记录着种种侵略罪行，并试图分析解释中国问题的背景、原因以及影响，虽然让西方了解了中国，为历史保留了珍贵的史料，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但

^① 张威：《“密苏里新闻帮”与中国》，载《国际新闻界》，2008（10）。

同情不等于热爱,背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利益塑造了鲍威尔等外报和记者观察中国问题、报道中国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二) 立场客观公正但非实质意义上的政治中立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在离开南京城时,城内发生抢劫,北伐军与外国侨民发生冲突。英美等国借保护侨民和使馆区为由炮轰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惨重,各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史称“南京事件”。随后,驻上海公使馆、外国商会、租界工部局等,提出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呼吁各国出兵干涉。

鲍威尔凭借其外侨的身份以及新闻的敏感,先于其他上海外报要求华盛顿特约撰稿人采访白宫,一定要拿到美国政府的立场。随后,《密勒氏评论报》发出报道,题为“中国局势尚未到联合干涉程度,美国无意参加任何为惩罚性联合行动”,正文为:“国务院一再强调说,在中国的任何美军部队,仅担负防卫性的任务,而绝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在提到南京事件时,国务院的官员称,还不能断定国民革命军应否对此负责。”^①该报道依然奉行客观陈述事实不做评论的一贯报道立场和手法,很好地充当了协调美国当局与美国在华侨民之间的关系,既符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同时也反映出《密勒氏评论报》积极对待中国问题尽量化解矛盾的态度。

此后,美国报纸不再像以往那样轻视中国的消息,开始大量刊载驻华特派记者的报道。“中国的局势在美国已变成第一流重要新闻,美国公众对此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②

《密勒氏评论报》关于“南京事件”的报道态度和立场,反映了一大批在华外报和记者的态度,识大体、顾大局是西方各国想扩张在华势力对记者提出的要求,各国对华政策的推行和利益的保障需要其在中国媒体拥有国际视野和全局观念。侨民在华的利益相较于大局而言的确稍弱一些,但在允许的范畴内,外报和记者还是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在这大、小利益之间协调关系,避免激化在华矛盾,《密勒氏评论报》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了美国当局、中国各方力量以及在华侨民之间的润滑油。

(三) 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但不涉足政治派系纷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为了了解华北的军事情况,鲍威尔曾亲自到北京并采访了交战双方的首脑,《密勒氏评论报》撰写了系列报道。但都是毫无倾向性的人物访问,本着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甚至没有任何评论,不存在丝毫政治倾向性。^③

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设立了“中国名人录”的专栏,里面就有对各派系领袖的描述,不偏不倚,客观中立。该专栏主要刊载介绍中国政界、商界以及各领域名流的传记,有封建军阀,也有国民革命领袖,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有上海黑帮头目,无论功过,只要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能出现在他的笔下。“正在筹划‘二次革命’的孙中山口无遮拦,善于夸夸其谈;吴佩孚‘能干而有个性’,却不懂政治,只是一个耽于豪饮、手不离卷的‘前清秀才’;‘基督将军’冯玉祥膀大腰圆,却是一个政治上‘靠不住的盟友’;矮小、温和而且具有幽默感的张作霖,则‘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关于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写实,多以其作为人的性格特点和外貌特征为出发点,文笔活泼,且以其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和自身功能为标准进行分类和评价,没有丝毫的政治倾向和对错之分。“文字仅仅被用来承载被采访对象给予记者的第一印象,因而,人物与社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十分模糊,不仅疏离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也难以反映出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

^① 张功臣:《东方寻梦:旧中国的洋记者》,8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② 张功臣:《身陷临城劫车案——“洋票”鲍威尔》,《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319~32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③ 张功臣:《东方寻梦:旧中国的洋记者》,8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各种势力将对中国前景产生的影响。”^①

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两极政治同时存在且一直较量，日本全面侵华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但两级政治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鲍威尔看到了复杂的政治，更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困境，他和《密勒氏评论报》不得不像其他外报一样要做出选择，但他和该报选的是中国局势而非国民党或共产党。哪怕鲍威尔被蒋介石政府任命为顾问，《密勒氏评论报》被纳入国民党宣传体系成为最得力的对外宣传工具，可在他看来“这种恭维颇具讽刺意味”^②。

鲍威尔促成了斯诺对“红色政权”的采访，并且表达了对斯诺的敬佩与理解：“当时报道中国事态的还有其它许多能干的美国记者和西方记者，为什么最后却是斯诺突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将中国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世呢？……斯诺是一个外国记者，而不是中国记者，然而他却是将红军长征的英雄传奇和中国解放区的建立写出来报告给外部世界的第一个人。这又是为什么呢？”鲍威尔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归结于斯诺的性格所起的作用，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那是一件“颠倒的怪事”。但我们的结论或许用斯诺临终时的一句遗言来表达更为恰当，他说：我爱中国。他敬佩并且支持斯诺的西行，显然是不太赞同抗日期间国民党的种种不利于抗日的行为，然而，从上述他对斯诺行为的理解看来，他也不想成为同斯诺一样“热爱中国”的亲共派。

结语

《密勒氏评论报》在华三十六载，由创始人密勒开始，就自诩为“一份独立的民间报刊”，随后由鲍威尔主持，进入黄金时期，延续密勒时期的大方向之外，将办报立场和编辑方针逐渐完善成型，到小鲍威尔时期虽然政治倾向明显，但仍坚持尊重事实、客观报道。作为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老资格的英文周报，公正但不中立的立场以及背后母国政府意志驱动的事实不容掩盖，但也的确发挥出了外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记录中国革命历程、向西方介绍中国的重要作用，主观上意图以美国精神看待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客观上提供了记录中国革命历程的独特视角，也间接搭建起了中美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① 张功臣：《身陷临城劫车案——“洋票”鲍威尔》，《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31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② [英]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9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

全球传媒论坛

The New China Seen through the Prism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透过美国记者的多棱镜解读新中国

(美)詹姆斯·布雷纳^①

荆会会译 刘明鑫校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2011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是帝制被废除一百周年,并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在回顾中国上世纪历史这个大前提下,我想谈一下四名美国记者是如何记录中国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况的。讲述从20世纪30、40年代的斯诺(Edgar Snow)开始,然后转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的《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和邬丹(Sheryl WuDunn),最后介绍2000年至2007年为《纽约客》杂志参访中国的海斯勒(Peter Hessler)。

在每一例个案中,美国记者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中国——斯诺见证了由毛泽东主持的土地改革运动,克里斯托夫斯诺和邬丹反映了由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和苏联与北约大国冷战的结束背景下的中国。最后,海斯勒谈到了中国的深圳和新经济,在那里,他记录下1400万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务工大军,那些渴望在城市实现富裕生活梦想却因某种原因在身份滞留在乡村的年轻人。

对于1937年在西部报道毛泽东的斯诺来说,他认为毛泽东与腐败的、残忍的和军国主义的国民党不同,是人民真正的领导者和改革家。

斯诺来自有很多农场和农工的美国中西部。他在纽约学习新闻学并在23岁开始游历世界。1928年,他在对上海做中途访问,却因此在中国度过了之后的十三年。他为不同的新闻机构工作,并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学。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与学生们相熟,并通过他们得知了毛泽东。1936年,他在夏秋之季与红军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他关于那段经历的书——《西行漫记》——在西方引起了轰动。

对美国人来说,毛泽东和他的运动代表了抵抗苏联斯大林和太平洋地区日本力量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和中国成为美国希望的一种象征。

之后,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将会向其他国家扩大影响。因此,那时为毛泽东写过具有同情意味传记的斯诺,被作为共产党的同情者列入了黑名单。这是20世纪50年代,那个年代因对共产党恐惧而被称为“红色恐怖”时期。

因此,斯诺的追随者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也改变了。他能轻易地接触毛泽东和周恩来,这被美国人看作是关系太过亲密。

他自己的国家排斥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北京——北京大学校园的湖畔。

克里斯托夫和邬丹是一对夫妻,他们从1998年起来到中国采访,在这里为《纽约时报》工作了五年。他们用一种与斯诺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中国。他们经历的是邓小平治理的改革开放的鼎盛时期的中国。

克里斯托夫在西雅图地区成长,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他在哈佛大学研修了政治,并在英

^①詹姆斯·布雷纳(James Breiner),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联合主任。

国牛津大学学习了法律。邬丹是成长在纽约地区的第三代美籍华人，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MBA和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学的硕士。

在克里斯托夫和邬丹采访中国的时候，西方世界正被新的希望理论所席卷。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叫做《历史的终结》。他声称，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思想大战终结了，自由民主制被普遍认为取得了胜利成为人类统治体制的最终形式。

因此，克里斯托夫和邬丹认为，中国将是下一个共产党这个老机构倒台让位于西方自由民主制模式的地方。

他们的书——《中国觉醒：一个为了崛起而奋斗的灵魂》——记述了对中国政府异议和反对的声音。他们到处寻找党组织内缺点的迹象，并把中苏两国加以对比。

克里斯托夫和邬丹深受“89学潮”的影响，他们的书被政府官员越来越多地贴上了需要限制的外国媒体的标签。

面对这些限制，他们做了正如每个美国记者都会做的事情。他们假设有故事被隐藏，然后努力查证。他们与党内官员冲突不断，与政府存呈敌对关系。这些在书中都有记载。

他们报道说，不管到哪都会有人跟踪，还时常被政府官员传唤，被告知他们有被驱逐的危险。确实有段时间，邬丹的记者证件被扣押了。

在他们离开中国前与一位党内官员的最后一次会面中，这位官员告知他们：关于中国，他们在不断的虚构故事、捏造事件和说谎。

然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是优秀记者的典范，并因“89学潮”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海斯勒从2000年到2007年担任《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他以这段经历写了两本书：《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海斯勒利用中国更进一步开放的契机，花费大量的时间描述了被新经济改变了日常生活的中国老百姓。

和斯诺一样，海斯勒在密苏里成长，在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和克里斯托夫一样，他获得了去牛津大学学习的罗兹奖学金，在牛津他主攻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学。他曾参加美国和平队，并被派往中国涪陵的一所师范大学教书。在加入《纽约客》之前，他待在北京，并为许多刊物自由撰稿，比如《华尔街日报》。

他的书涵盖了一些他在《纽约客》期间的作品。他描述了在北京胡同的一位老人抵抗为建设高楼大厦拆除自己房屋的故事；描述了深圳一位讲述在为年轻工人呼吁的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那些工人阐述了他们的孤独和奋斗，以及如何努力适应这种与他们乡村生活完全不同的种种要求；还描述了一位企业家努力开办工厂的艰辛奋斗，这个工厂用从西方国家购买的旧机器设备生产胸罩上用的金属钩。

为了写《寻路中国》这本书，他沿着长城进行了长达七千米的汽车旅行。他探索了中国西部的省份，描述了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尤其是一位维吾尔族货币交易者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故事。

斯诺、克里斯托夫和邬丹关注的是地缘政治，海斯勒关注的是个人和地方，以此来表现蓬勃发展的经济对国民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与旧观念中的乡村生活发生冲突的。

因此，他们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描述了中国，他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美国民众。对于三十年代的中国来说，这个故事是关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巨大的思想战斗。克里斯托夫和邬丹为那些期待中国步苏联的后尘转换为自由民主制度的观众而写作。海斯勒为对中国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它是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感兴趣的观众而写。

他们每个人都通过一个特定的棱镜观察与自身相关的中国，他们都认为自己足够客观并说出了真相。但他们描述的中国都是不同的。当然，他们显示出他们和他们的读者一样是如此地关心中国。

全球传媒论坛

THE TOP FIVE STORIES I WOULD TELL AS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IN CHINA NOW

作为身处中国的外国记者，我最想作的五类报道

(美) 约瑟夫·韦伯^①

吴巧云译 刘明鑫校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能被邀请参加本次会议。在这么多杰出的学者和教授面前，我觉得自惭形秽。因此，如果我哪些地方说错了，恳请大家原谅。希望大家纠正我的错误，不要让我在中国剩余的时间里继续错下去。

我在苦苦寻找对大家有用并且能让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我的同事 Breiner 教授，同时也担任清华大学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主任，帮我想出了一个有益的思路。由于我曾在加拿大做外国记者，并曾长期在美国采访，他想大家可能会对我将要讲述的新闻和故事产生兴趣。

这或许会让您知道，作为一个直到今年九月八号才来到中国的美国人，是什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会让你们知晓，一个外国记者在这里的工作时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告诉你们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特殊的时期，一个美国记者在这里工作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那么，假设这是真的，就让我把希望能够发回到美国编辑手中的报道选题清单分享给大家吧。

——女性在中国的地位——男性和女性是不是平等？

这在美国也是一个持续性问题，当然，也可能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两年前我最小的女儿还只是一名本科生，她在非洲的喀麦隆待了一个学期，写了有关一夫多妻制婚姻中妇女权利的文章。在美国，一些杂志如《财富》杂志会定期撰写在美国商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的报道，而其它出版物通常会撰写一些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性的故事的文章。这里的出版物也有类似报道，同时对外国媒体的报道予以关注。

毫无疑问，中国也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领导人。其中有华为公司的孙亚芳、SAP公司的萧洁云、SOHO中国联席总裁张欣和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以及海尔集团杨绵绵、海信集团总裁于淑敏和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小琳等。

当然，在中国还有更多优秀的女性，而不仅仅有这几个人。我相信毛泽东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但看起来能取得更大成就的女性不是很多。例如，在中央政治局任职的女性有多少？据去年六月份彭博新闻的报道，在过去的62年中，只有五名女性担任政治局委员，其中三名是高级领导人的妻子或遗孀。现在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名女性：国务委员刘延东。再往下一级，女性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占比例刚刚超过6%，而在四十年前女性占了10%以上。

当我的几个学生写作的关于失业和就业不足女性的论文中，引用了人力资源管理者的

^① 约瑟夫·韦伯 (Joseph Weber)，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新闻学副教授，时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客座教授。

话。他们坦率地说不会雇佣年轻女性，因为他们预计这些女性会离开去生孩子，并且不再回来工作。对此我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竟然会公开表示只聘用年轻男性。他们的直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如果在美国，这样的话语很可能导致一场官司。但是对中国来说，如果年轻女性不能工作，这将成为一个大问题，使她们今后更难步入高管之列。

——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

我的学生一直在对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困难这方面作报道。政府承认他们统计的4.1%的失业率低估了问题。很难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问题。但看起来中国确实面临着为许多人增加就业机会的挑战，就像美国面临的挑战一样。

如果基于此点，我会写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似乎涉及技能和经济需求的不匹配，以及在过去十年大幅增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的以服务 and 消费为导向的领域之间的不平衡。看起来中国需要创建一些能够招收法律、应用数学、国际贸易、英语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求职者的公司，而这些专业都处在麦可思咨询公司警告的10个领域之中，在这些领域有可能出现就业者供过于求的现象，并导致低工资和高失业率——正如我的一个学生所写的。

——中国建设重大项目的的能力。

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在50年前只是一个想法并且再过40年也不会完成的非凡的努力令我着迷。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使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得到人民的支持并把工作做好呢？这让我想起美国建设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这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伟大的工程和政治成就；它还让我想起了美国为把人类送上月球所做出的努力。

这样大的举措在美国进行得十分艰难，中国仍然在做这类事情。公平地讲，美国发明了互联网，有人就可能认为在某些方面是重要的，当然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尽管如此，中国在利用和统筹其资源方面有着非凡的能力，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三峡大坝是另一个最近的例子。但早在15世纪，当郑和率领多达3万官兵组成的庞大的船队航海的时候，中国就表现出了办大事的能力。同样，我对关于在几周前刚开始运转的发射“天宫一号”飞行器的空间实验室的写作也很感兴趣。对这个项目的追踪将会很令人兴奋。我想中国也将及时做出处理污染问题等类似的重大举措，而且我知道发展绿色能源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公众将需要更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这将是一个值得连续报道的选题。

——中国对市场的接纳和市场体系的问题。

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商业能力已经被世界知晓。如你所知，在被抑制了多年后，邓小平使这种能力复苏了。像别人对我描述的那样，在进行社会转型的时期，这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和调整，包括收入不平等及其他问题。但它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我相信它将重塑这个国家，并已开始这样做。它将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找到答案，范围涵盖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

相信无需我赘述，各位作为史学研究者应该知道，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中国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西方，无论是在商业、科学或其它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看起来都显得相当不发达。仅仅在前两三个世纪，西方才超越中国。我相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恢复市场并向西方开放的举措——如果能够持续下去——将使中国再次回到领先地位。事实上中国已经这样做了。

——最后的选题是一个敏感问题，这是一个有关自由和选择的问题。

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与世界各地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公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公民会要求更多的权利吗？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的自由，这些也许是人们未来会寻求的。还有参加领导人和本地及国家各级政府机构选举的权力。人们也许会问：“既然在商品中建立起了市场体系，为什么在领导人中不行？”

人们可能并不认为这些需求都那么重要。毕竟，如果很多人对物质生活感到满足——有房子、车子 and 好工作，他们也许会放弃其他东西。通过适应现在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已经带

领这个国家走了相当远的路程。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例如——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灵活性。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领导人在面临众多挑战时可能同样会这样做。但人民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和选择的压力可能会增大。我想，领导人如何处理这些压力，将是一个值得一做的重要报道。

再次感谢你们邀请我到这里，我希望这几点想法能对你们有所启发。

本期特约

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限制、挑战与机遇^①

(加拿大)肖恩·冈斯特^②

纪莉^③译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传播与环境的关系,并力图说明传播如何是环境问题的一部分,以及如何能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方面。论文首先从对消费主义的描述提出,消费者文化构成了人类生态意识发展的具体障碍。接着论文探讨了新闻媒体在环境问题报道上的应该承担的媒介责任,以及现在令人堪忧的现状,从而提出媒介的商业化运作造成了公共认知的障碍,妨碍人们参与环境危机问题的观察。最后,论文提出传播如何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通过价值观改造,让自己成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文章最后还对中国目前的环境传播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环境,传播,消费者文化,商业媒介,价值观

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how communication is p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as well as part of the solution. The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how consumer culture becomes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n, it explor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news media on environmental reports and its problematic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rticle proves that consumer culture and corporate media constitute barriers to public awareness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magnitude and urgency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Lastly, 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communication can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its impact upon dominant values in the society. The article also raises its opinions on situation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① 本文为肖恩·冈斯特在赵月枝的长江学者暑期课程中所做的讲座(中国传媒大学,2011年7月),纪莉受赵月枝委托将讲座内容翻译成中文,形成此文。

^② 肖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加拿大西蒙·弗雷泽传播学院副教授。

^③ 纪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consumer culture, commercial news media values

复活岛与环境传播

文章一开始我想说个故事。这个故事能说明我们在传播与环境领域的处境。在罗纳德·赖特的《进步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和贾尔德·戴尔蒙德的《崩溃》(Collapse)一书中，都拿这个故事来警示人类，当我们失去了对自然环境的最终依赖后会发生什么。

1722年的复活节那天，在远离智利西海岸的太平洋上，一支荷兰舰队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岛屿。岛上没有一棵树，却矗立着几百个巨大的石雕，有些达30英尺高。一开始，石雕的起源是个谜。不过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岛曾经并不荒芜，事实上它曾经覆盖着肥沃的火山土，并有着茂密的智利酒椰子树林，这种树可以长到橡树那么大。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波利尼西亚人曾经在这里生活，并在随后的5、6个世纪中成为兴旺的族群。与其他类似的群体一样，他们开始建造越来越大的石雕以敬重他们的祖先。而为了运送和树立这些巨型纪念碑，他们就需要砍伐越来越多的树木。大概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的某个时候，岛上所有的树木都消失了，岛上的族群进入到毁灭性的衰落期。不同部落派别之间发生着暴力冲突，而且近两代岛民再也不能建造深海独木舟去捕鱼，这些事实更加重了衰落的进程。

听到这个故事我们立马会想问（这也是赖特和戴尔蒙德在书中都强调的）——他们砍倒最后一棵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根据赖特的观察，“砍倒最后一棵树的人能*看到*那是最后一棵树，也能完全确切地知道再也不会有一棵树了。但他们还是把它给砍了。”（2004：60）我们可能难以理解或想象那些人的理由是什么，而赖特和戴尔蒙德用这个故事提了个问题：我们此时此刻跟那些复活岛上居民们的处境不是一模一样的吗？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对我们所作所为的最终影响视而不见？如果确实如此，那是为什么？而我们，作为个体或一个社会，愿意接受来自自然环境的信号——我们已经接近（或已经超过）增长的极限吗？或者，在人类和自然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反馈的道路上是否存在堵塞和障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最熟悉环境危机和最受环境危机影响的那些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沟通传播路线是否存在障碍？

环境传播的中心目标是了解我们的传播系统、我们的文化实践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信念在塑造（经常也是压制）我们的环境问题意识、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办法）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该领域的奠基学者之一罗伯特·考克斯（2007）已经指出，历史经验已经非常有说服力地证实，人类如何进行环境传播最终可能成为决定21世纪人类命运的主导因素。很显然这是个大胆且具挑衅性的断言。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广义的传播概念，看到传播如何塑造了从个人的价值、信仰和行为到政府和公司的政策、倾向和行动，那么就会看到这个论断显得更具合理性。

然而，这并非理想主义地将传播表述为一种自主力量，拥有某种特权，可以像操作傀儡一样控制个体和制度因素。相反，这个领域最好的研究采用的是唯物主义分析视野，考察政治经济学传统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媒介和文化采用现在这种形式，以及它们如何常规化地被用来强化现存的权力结构、为其辩解、并使其自然化。正是这些权力带来的威胁将人类拽入一个生态非常黑暗的未来。

但是，在理论上将传播看作是一种权力、支配和霸权的工具，还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半。事实上，（依我看）环境传播最令人激动的一个方面是，它比起这个学科的其他领域更强调传播能够而且必须在激发和动员公众，让政府采取行动关注环境危机，在这些方面更扮演着赋权的角色。而且，环境传播不只是简单地培养了人们对环境灾难的畏惧，而且也激发和强化了一种集体意愿，要为每个人建设一个更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让人类社会做出调整，在生态系统有限的范围内生活，这需要我们改变几乎所有方面：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旅行，我们如何进食，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的社群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管理自己，以

及我们社会最首要的东西是什么。

因此，我今天想做的是描绘传播如何既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

警告：环境危机

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准备将我们所面对的生态危机的广度、深度或者紧迫性，各种纠结的问题等作出综述。不过我要引用耶鲁大学林地与环境研究学院院长詹姆斯·斯佩斯（James Speth，2008）在过去十年所说的话。

“环境的危机到底有多严重？”他问道。“这里有一个衡量问题的方法：我们只要按照今天的做法继续下去，我们所做的就是破坏这个星球的气候与生物圈，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被毁掉的世界。不需要有任何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只要继续按照现在的标准排放温室气体，只要我们继续剥夺生态系统，在现有标准排放有毒气体，到本世纪后半叶，这个世界将没法生存。”（2008：X）

斯佩斯在他的书《世界边缘的桥》里，为环境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提供了非常优秀可行的总结。

那么，我们的传播和文化系统到底在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俯瞰整个图景，两样东西跳到了中心位置上：消费者文化和企业新闻媒体。

消费者文化与经济增长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最有名的环境运动家比尔·麦克库本（Bill McKibben）所说的生态危机的最大障碍：消费者文化。很多批判研究都探究了广告和商业媒体在奠定消费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方面扮演的角色，认为它们推动了20世纪商业主义的膨胀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例如，斯图尔特·埃文（Stuart Ewen，1976）在此研究传统方面贡献率最杰出的书之一《资本的意识》，在书中他描述了在20世纪的前半段，北美广告商如何成功地将自由、安全、自治、社群和快乐的普遍精神嵌入到商业资本主义之中。通过心理学的体察，逐步发展文化工业中以图像为基础的大众劝服实践技巧，广告商们将这些精神嫁接到大众生产的商品中，并由此将消费定位为最好也是唯一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方式。过去，建立一个更好社会的梦想曾以一种集体的、政治的，以及常常是反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而这个梦想现在被瓦解并转入到一种意识形态整合的力量之中，它可以将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扩展到工人阶级那里，而不威胁现存的权力与不平等。

美国广告业总裁艾尔摩·卡金斯（Elmo Calkins）在1927年为《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文章，叫《美丽，新商业工具》，他是最早看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为商业产品扮演创造和扩张市场的活跃角色的人之一。他提出，商业对经济和产品的实用性投入了太多关注，比如功能性，使用便利性和价格等等，而对符号、文化和传播维度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强调后者，就可以无限有效地产生和推动消费者需求（更别提那种让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弄得有区别的伟大方法了）。“商品有两类。”卡金斯写道：“一类是我们使用的，比如摩托车、安全剃须刀，一类是我们消耗的，比如牙膏、苏打饼干。消费工程必须看到我们消耗了我们仅仅需要使用的商品。”（引自埃文1988：51-2）哈雷·埃尔（Harley Ewen），通用公司艺术与色彩部的领头人，曾使用动态荒废这个术语呼应了前文的智慧，以此术语描述文化（或者时尚）如何被用来加快了我们的步伐，让人们对现有的东西感到不满。

广告塑造了我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感知，而埃文的“自商品”概念提示我们，消费文化的一个首要效果就是将人生产为消费者，一个个主要通过消费来透视自己的能动性、身份和社群的个体。这样一来，一个人的身份，不管她是一个母亲，或者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现

代女性”，都是通过消费某种特定的产品来最好地实现、交流和体验。我们通过其他商品主体不停地衡量自身，这种动态的竞争的逻辑让每个个体不停地卷入消费的模式中，以维持自己在不同社群中的地位和身份。

到了1950年代（与持续的经济繁荣相扣应），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社会。消费社会的生活时尚通过以自我中心的郊区发展模式最好得表达出来，它将消费放到每日生活的核心。1955，市场经济学家维克多·雷波（Victor Lebow）对此非常有预见性和洞察力地描绘道（你们可能在安妮·里昂纳多在《东西的故事》一片中见到了类似的对消费社会的绝妙批评）：

我们巨大的生产力经济要求我们将消费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将购买与使用东西转变为仪式，我们在消费中寻求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社会地位、社会接受度、地位的衡量都建立在我们的消费模式上。我们今天生活的意义和重要性都是通过消费话语表达……。我们需要用以消费的东西，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花光它们、用坏它们、替代它们、舍弃它们。（1955：5）

这段话里最惊人的一面就是指出了文化与传播担任着维持和强化将消费作为经济基石的责任：仪式、精神、身份、社会地位、意义和重要性，这些都是雷波认为保证东西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消费、花光、用坏、替代、舍弃”的重要手段。

与消费主义步调一致发展起来的还有商业媒介体系的发展，它将广告和推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让其他的文化和传播形式都从属于这个目标。美国各类媒体依靠广告商带来的利润，它们不论在类型、形式和内容上都没什么不同，都致力于创造对广告友好的环境。正如达拉斯·斯麦斯（Dallas Smythe, 1977）所说，媒介公司生产的商品不是杂志或者电视节目或者报纸，而是被卖给广告商的受众。这些受众的价值完全依靠依赖于他们的消费癖性，为大众媒介尽可能推销（或者至少不挑战）消费主义带来了结构性诱因。

在过去的60年里，雷波苏所看到的消费主义已经渐渐全球化。他所看到的现象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分别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1980年代扩散到中南美洲，1990年代扩散到东欧，而最叹为观止的就是在近15年间扩散到中国 and 印度（程度可能略小点）。尽管这些国家仍然还有大量人口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完全参与到消费者文化之中，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很客观地说，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精神。也就是说，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消费来组织，这点已经成为了一种广泛共识，非常适应地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种族和宗教体系内共存。福山曾经将自由主义民主指认为“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可能更准确的应该是将这个标签贴在消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上。不过，我们还必须在这个“历史的终结”的标签上增加一点世界末日的潜台词，而这个应该不是乐观的福山所乐见的。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传递了一个简单而令人心颤的讯息，那就是建立在无休止的消费增长之上的经济体系与有限的生态体系之间基本不能共存（生态系统吸收废弃物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它主要是基于计算机模拟，推断现存资源使用的趋势，人口增长的趋势，工业产出、食品供应以及对未来的污染的趋势。该报告总结说，一个世纪以内我们将达到增长的极限。现在40年已经过去了，该报告的基本发现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挑战，事实上，例如漏油、气候变化等现象只是加强了该报道的基本逻辑（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书所说的就好像是在复活岛上告诉自己的邻居，砍伐所有的树木未必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好主意）。

来自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比尔·里斯（Bill Rees）提出“生态足迹”概念，这是对气候变化最近的一个警示。该概念将消费模式转化为地理术语，以便于就什么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更好地交流。里斯解释说：“如果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今天以北美的水平消费，我们将需要再有4个像地球这样的星球来生产所有的资源，并消化废弃物。”将北美消费模式普及化，换个直白的话说，就是集体自杀（或者至少在接下来的50到80年间，人类

的灾难和死亡将达到各种极限)。但是这却是每一个政府看来都决心实质上要走的道路，而这一趋势最近得到了证实。政府开动消费的引擎，带来真实的令人心惊的公共资源的消耗，而这只是在当下被全球经济危机所阻滞。消费文化与经济增长交织在一起的叙事在我们的传播媒介中如此广泛，无处不在，与政治和经济机构深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深刻地编织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此构成了我们的个人与集体身份，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能想象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借用詹明信(Fred Jameson, 2003)的意思，相比世界的终结，我们更难想象消费资本主义的终结。

下面我不再对消费者文化进行广泛的批评，而是转向消费者文化在普遍的生态意识发展中构成的具体障碍。有三点我觉得尤其重要。

第一，市场全球化与马克思曾说的商品拜物教结合在一起，有效地使消费者根本不用经历甚至不去想满足他们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与自然生态。当我们买什么东西时，我们一般不去想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谁生产了它们，它们如何被生产出来，或者它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既包括对工人的，也包括对生态系统的)。相反，消费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最末端所遇到的是一个物品，这个物品已经从它的生产历史中完全脱离了。消费者文化同时还倚重并加强了生产世界和消费世界的分野，在商品形式的语意虚空中肆意填满消费文化的价值、意义和快感。正如苏特·杰哈利(Sut Jhally, 1987)在他的《广告的符码》一书中所说：“商品拜物教的构成首先是清空意义，掩藏通过人类劳动而物化的真正社会关系，让假象的/符号的社会关系有可能在第二层表意系统中注入到意义的建构中。把生产排空出去，把广告充盈进来。真实是假想的。”(1987, 51)

我们被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先进的传播系统所包围，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对包围我们的各种东西更不了解，这点还不如我们的祖先。消费者文化将这种状态正常化，用诱惑(在道德上贫乏地)我们进入到全球市场的商品之中，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想来安慰我们的心灵。消费者文化和市场一起系统地工作，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道德维度剥离，赋予消费者一种奢侈，那就是永远不必面对他们的行为如何有效地影响了其他人或者自然世界。在消费者文化中，忽视真是一种福气。我们还同样如此丢弃我们用完的东西。这样一样，消费者几乎从不“直接地”或者“文化地”体验生产系统中任何拉动消费引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反馈。

第二，面对时不时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批判脉搏，消费者文化在平复与整合这些批判脉搏上表现得尤其有弹性和有创意。例如，西方公众对于环境危机的意识逐渐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了“绿色消费”的兴起，倡议消费者可以且应该在选择产品时承担道德责任，选择以环境可持续方式生产出的产品。这种消费主义提出弥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拉动个体的市场选择，让其成为一种集体行动，以奖励那些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的公司，惩罚那些拒绝这样做的公司。

从一个方面来看，绿色消费主义有其积极的影响，它对商业施加了压力，让其采用更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实践，同时也培育了个体环保意识的萌芽。但是，消费者和公司企业在传播上具有结构性不平衡，这意味着很多公司发现改变形象比改变实际生产实践更方便，成本更低(这个被人们称为“漂绿”)。更重要的是，绿色消费主义的话语是如何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预防针，让消费者资本主义在面对环境保护主义和增长的极限的挑战时免疫，让公众以为只需要对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行微调就可以解决环境危机。于是，对于消费问题的解决变为更多消费，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变戏法，而资本主义文化机构自从1960年代成功拉拢反文化运动之后，就对这个招数愈发炉火纯青了。

第三，消费者文化高度提倡消费者主权与能动性的个体观念，腐蚀了更集体形式的政治行动的可能(与吸引力)。在我看来，个体化可能是消费者文化最有害的影响，因为它让消费者文化成为人们唯一能够想象实践自己自主行为的场域。这不仅是文化的影响或者意识形态

的影响，而且还带来个人主义的话语（以及消费者的主体位置）已经深深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来说，消费者文化反映、表达大众经验，并与其产生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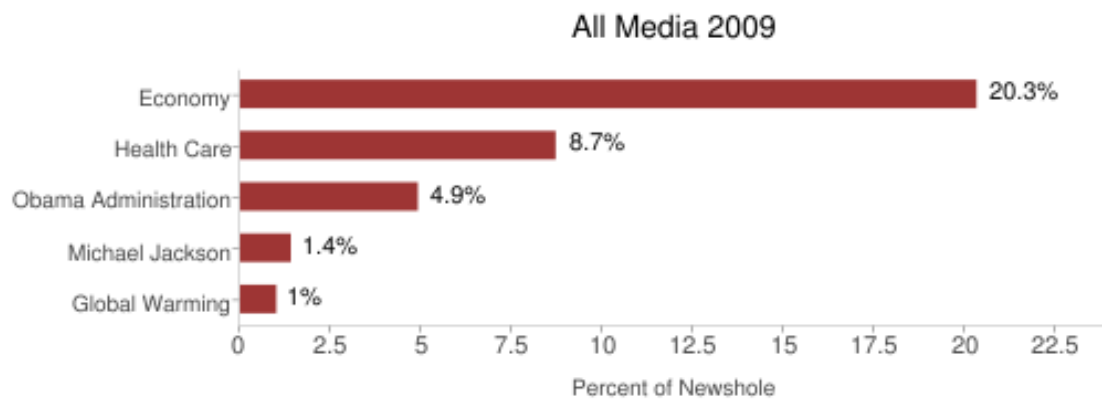
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现在中国可能也一样）在哪里体验到生命中最大的权力、自治以及自由？我们在哪里被最多地“赋权”，为我们自己做决定？那不是在政治领域。政治领域总是被描绘为腐败的、令人生厌的，主要被那些只对自己的私利忠诚的政客占领。大部分时候，政治看上去都是一场表演，我们可能观看它，但没被教会或者被鼓励去参与其中（只是隔几年去投个票）。那也不是在工作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为了效率和生产力最大化而被细致控制和管理的对象，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能动性，只是将组织规范和目标内在化。

相反，我们恰恰是在作为消费者的选择上体验着我们自己生活中的能动性和自治。消费就是自我们出生之后就on知道我们如何去做，去享受什么，擅长什么，以及社会化地去做什么。我们作为个体消费者有很多很多思考和行动的体验。但是，正如麦克·马尼艾特斯（Michael Maniates）所说，当能动性和责任感以这种方式个体化时，“没有空间去思考政治权力的机构化、本质以及操作，也没有空间去思考共同改变权力分配的方式及其社会影响，即‘机构化的思考’。……相反，严肃地面对……威胁社会环境的过程落到每个个体的头上，每个个体都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在独自行动”（2001：45）。缺乏政治的或者机构的能动性，个体看起来只有三个选择，要么以一种荒诞的方式投资快乐，要么以为回收垃圾将解决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或者愤世嫉俗地逃避并接受一个观点：这些问题基本根本就是无解的。

企业/商业新闻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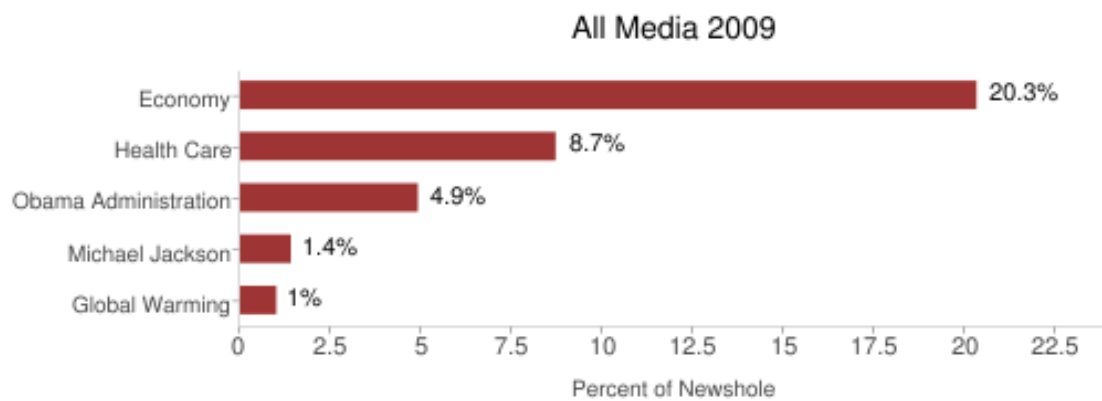
根据传统的媒介的自由主义理论，新闻媒介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公民能够获得一天之中重大事件和重要议题的广泛信息与观点。例如，气候变化具有潜在的灾害性影响，而且需要我们立刻采取行动面对它，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议题主导着新闻。毕竟，持续的科学研究，以20比1的比例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将会更糟，而且比预期到的更早。现在不乏各种极端气候——热浪、干旱、洪水、强暴风等等，这些都证明了（伴随着可怕的图像）气候模式的变化，而这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特征。在政治方面，关于这个议题的国际峰会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世界各地成百上千的气候运动分子在此发起了广泛的动员运动，要求他们的政府采取更大的行动。但是，当我们看看新闻媒介时，我们只能看到相对很少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或者，其他环境议题的报道）。

“卓越新闻计划”，一个美国组织，追踪了美国媒体对于不同议题的报道。它用数字显示，美国所有的新闻媒体（包括广播、有线电视、报纸和网络）的主要报道都贡献给了5个议题。最大的议题是经济，占20.3%，健康保健占8.7%，奥巴马政府占4.9%，而娱乐方面迈克尔·杰克逊的奇观报道占1.4%。最后，我们看到了全球变暖，占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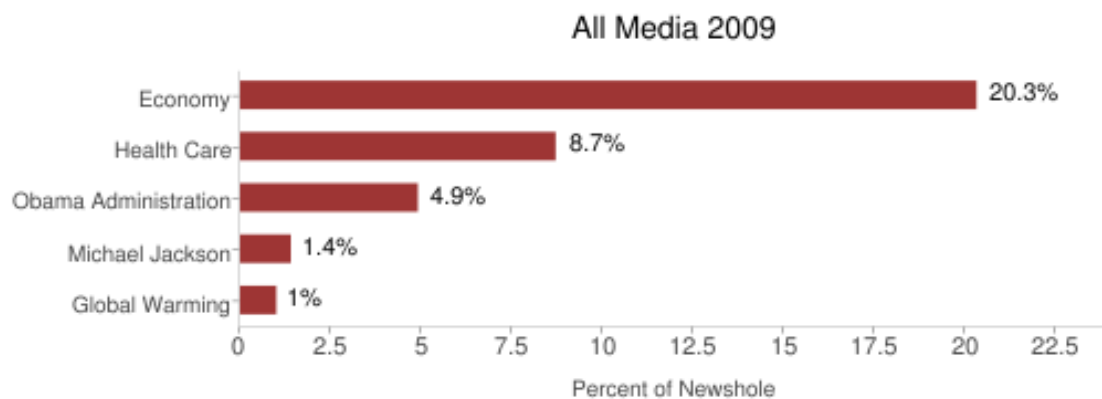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http://features.journalism.org/year-in-the-news>

再看看电视网和有线电视新闻的数字（这是大部分美国人获得新闻的方式），全球变暖占有所有电视网新闻报道的 0.8%，而且刚刚达到有线电视新闻的 0.5%。它们把四分之一的报道都贡献给了迈克尔·杰克逊（皮尤研究中心，2010）。想想我们面对的危机之重大，这些数字真是惊人的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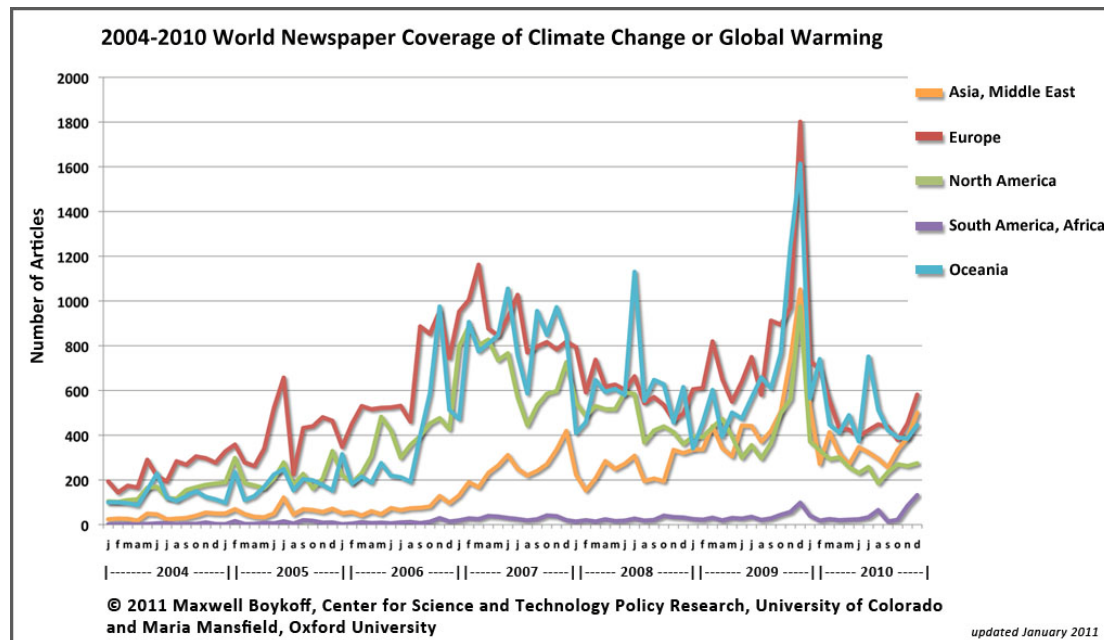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http://features.journalism.org/year-in-the-news>



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s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http://features.journalism.org/year-in-the-news>

而更令人警惕的是新闻报道近来的趋势。下面一组数据显示了 2004 年至 2010 年世界各地的报纸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在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达到峰值之后，我们看到气候变化新闻报道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降幅，降到了我们这些年所见到最低水平。非政府组织《每日气候》

每天收集和公布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它发现这个话题的报道从 2009 至 2010 年降低了 30 个百分点（Fischer 2011）。议程设置理论 40 多年的研究，确立了媒介对某议题的关注水平与公众（以及政治精英）对该议题重要性的获知之间具有相关性。简而言之，气候变化新闻报道的减少可以被看作是对于该议题兴趣水平和关注度的降低，近来的舆论调查证实了这个趋势，持续的政府不作为也说明了这个趋势，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如果说新闻的目的是要告知公众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事实，那么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北美新闻媒体在这个议题上报道的减少更能说明媒介责任在惊人的退缩。如何解释这种失败？为什么报道这么少？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思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甚至心理等广泛的因素。不过，我们可以先确认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奥美·奥雷斯克斯与埃里克·康维（Naomi Oreskes and Erik Conway, 2010）在他们最近出版的一本相当优秀的名为《贩卖怀疑的商人》的书中指出，石油产业与保守派智囊团已经发起了一个极其成功的公共关系运动，培养人们对气候科学产生怀疑。这个运动的要旨就是建立一个支持所谓气候“怀疑论”的小型网络，这种怀疑论有攻击性地挑战 1990 年代以来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舆论。这些怀疑论者大部分不是气候科学家，而且他们根本上在科学领域没有信用可言。但是他们已经非常成功地将自己在新闻媒体中确立为专家，帮助创造错误的观念，说科学家对于气候变化有很多的分歧，气候变化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

马克思·博伊科夫和朱蕾斯·博伊科夫（Max Boykoff and Jules Boykoff）在 2004 年写了一篇非常棒的文章叫《偏见的平衡》，在文中他们探索了这些怀疑论者如何利用新闻的平衡原则确保自己的观点与大量气候科学家、IPCC 以及世界各地的主要科学机构在媒体上占一样的分量。这种对“平衡”的操作——让议题的两面都呈现——就是记者，尤其是对该领域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记者如何向自己（及其读者）确保报道“客观”的方法。不过在气候变化方面，这种操作带来了新闻报道的强烈偏见，导致媒体在过去 20 年里向美国公众根本错误地再现了气候科学的状况。有一项调查分析了美国主要报纸在 1988 至 2002 年间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故事，发现一半以上的文章将气候科学描述为不确定的，认为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暖正在发生和没有发生的科学家各占一半。这个公共关系运动在气候变化报道方面所做的简直是一场灾难，导致一些气候科学家如 NASA 的詹姆士·汉森（James Hansen）

将其描述为反人类罪行。不过,从石油产业和保守派智囊团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使减排的行动放缓,这真是相当成功。

从长远来看,这个运动最毁灭性的影响并不是繁殖疑惑本身(这个可以通过科学证据来消除),而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新定位。在北美,它将气候变化从一个科学现象转变为意识形态现象。当美国人谈起气候变化时,他们不是依据自己受教育的水平或者科学阅读能力,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职业或者收入。相反,他们凭自己的政治归属和意识形态世界观来判断。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党人,你相信有气候变化。如果你是个保守派或者共和党人,你不相信。这种观点已经几乎坚不可摧,不管面对什么相反的科学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在过去50年间有很显著的提高(也有几个严重的例外),但是对这个事情的公共舆论却没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将疑惑与政治主观性融和到一起,否认气候变化与保守派政治信仰已经不可分了,这就使得美国几乎不可能就气候变化进行任何形式的有效政治讨论。事实上,我认为那么多主流媒体在报道该议题上犹豫不决可能缘于出版商与广播公司经营人的认识,他们认为即使提及这个议题都会让他们承担流失很多受众的风险,所以最好干脆避免谈它。因此,近来在关于极端气候比如洪水、干旱和风暴的新闻里,气候变化已经少有涉及。

第二,北美媒体的政治经济学在塑造环境新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传播学者凯瑟琳·霍尔和乔·凯普拉(Kathleen Hall Jamieson and Joe Capella, 2008)指出,在过去20多年里,一种“保守媒体阵地”在北美逐渐成形(在加拿大程度略小)。福克斯新闻、保守派报纸和右翼政治脱口秀节目一起构成了财政状况良好、合作成熟、越来越自足的传播体系,在气候变化议题以及环境议题上,它既是保守派观点的传播工具又是其回声筒。保守派媒体自愿成为右翼智囊团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伙伴,为他们提供友好的路径,让他们不仅可以散布他们对气候科学的怀疑,而且还能谴责任何政府进行法规上的动议,将这些动议再现为对自由以及普通美国人生活的威胁。这就帮着维持并不断激活了“经济与环境对立”的框架。在过去的30年里,这个框架使用得非常有效,它倡导一种恐惧,使得政府不能实施任何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因为人们害怕政府的这些行为会毁掉他们的工作,并提升商品价格。保守派媒体的重度消费者,在美国公众中占有百分之20至百分之30的比例。可想而知,相比较那些阅听其他媒体的人而言,他们更容易在气候科学和气候政策上被误导。

越过保守派媒体,我们看到传统新闻组织的收入在下滑,再加上几十年来的媒介融合与所有权集中,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分配到各种新闻中的资源。我之前提到的“卓越新闻项目”的研究估算,美国报纸在过去十年里大概失去了百分之十的报道与编辑容量。这种裁员重创了环境报道,尤其是让专长于环境议题报道的记者迅速减少。比如在1989至2006年间,美国日报上科技类特写的数量缩减了三分之二,而在2008年12月,CNN裁去了所有的科技与环境新闻的职员。除了环境议题报道减少,环境新闻记者数量减少也使得记者更容易被特殊利益所影响,比如气候怀疑论者或者工业集团,这些利益群体努力用其特有的方式“玩转”这些议题。关于本地环境议题的报道(或者气候变化等全球化问题的本地影响与解决方法)被一般化的、普遍化的报道所取代,尽管这些报道常常不能与本地观众或者读者产生共鸣。

关于新闻媒体,我最后要说的它们如何再现了气候政治。新闻媒体是大多数我们了解政治的地方,包括我们如何进入到政治过程之中。尤其有一点就是,媒介在决定政治功效水平上有非常高的影响,也就是高度影响着一个个体对自己参与政治是否有真正的影响的感知。气候变化的政治功效水平是相当低的,很多人相信他们对迫使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是无能为力的。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提到的,主流媒体如何再现气候政治与此息息相关。首先,气候政治和政策被倾向于描绘为国家和全球精英的专属领域,参与的个体没啥行动空间,只是无权的、愤世嫉俗的观看者。偶尔有很少的情况是,气候政治的确成为了新闻,而焦点往往是国际会议比如哥本哈根会议,这只是加深了一种认识,那就是气候政治

是远离普通人影响的一个东西。第二，在过去十几年里，气候政治的主流叙事框架（这个在哥本哈根报道达到顶峰）就是讲失败的故事。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差异实在太强，石油公司阻止法规制定的权力实在太强，政治家实在是太虚弱，不能推行需要的变化等等。这些故事情节有部分是真的，因为现有政治机构很多都不能解决气候危机。而将焦点放到失败之上也加强了一种认识，那就是气候政治一直都只是一种公共关系上的空洞的实践，那些有权者假装在行动，其实什么实际的事情都没做。相反，那些讲成功的政府行动，可能让公众重拾对政治的信仰，将其当作是具有能动性和效用的场域的故事，少之又少。第三，正如凯文·德·卢卡（Kevin De Luca, 1999）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环境保护分子总是以一种单一维度在媒介中再现，他总是带着敌对的模样，媒介将他对挑战现状描绘为威胁现有大部分公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福利。这样一来，环境保护分子看上去基本上和“正常人”不同，这样就使得读者或观众更不会将行动主义看作是可行的、可取的。而行动主义正是一种政治参与，值得效仿。

由此，人们对解决气候变化的政治机构和政治过程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气候变化开始成为一种看上去根本没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对于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忽视它们。他们不理睬它们。他们欺骗自己说，这些问题不存在或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希望其他人能解决这些问题。简而言之，他们尽其可能地避免思考它们。至少在北美，大部分公众和大部分商业新闻媒体今天就是这样做的。

这就是我对消费者文化和企业媒体如何构成了公共认知的障碍，妨碍人们参与到迫切需要参与的环境危机问题的粗略观察。

作为一种解决方式的传播/媒介：价值、传播与行为改变

在此，我还想说传播如何能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还想很清晰地指出一点，任何能够挑战消费者文化无处不在的霸权，任何能使替代性新闻、信息和观点得以传播的东西都在解决环境危机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干预和影响。我们努力去保护一些社会和文化空间，让它们脱离广告和市场的魔爪——比如儿童期、教育、政治、保健、宗教——这些都帮助我们保护了一些空间，使我们可以发展自我、身份认同和社区，让这些东西不仅摆脱消费主义，而且成为消费主义的替代品。同样，使用新的信息技术避开商业媒体机构，建立起批判新闻和观点的反向网络，也能为我们打破商业和企业新闻对公共话语的垄断，提供必要的传播设施，使草根社会与环境保护行动主义一波波发声，并带来一些政治过程，比如“世界社会论坛”。

环境危机的传播根源可以追溯到环境传播构成的狭窄定义上，同样，对这个危机的解决也在于其狭窄定义。环境行动主义未来的成功可以很好地倚仗超越环境保护主义本身的狭小，拥抱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议题。这些议题可以构成民主和社会正义更宏大的视野。实际上，这种视野的扩大正是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环境正义运动成为动员穷困人口和边缘化人群的有效运动。

我现在要转换一下方向，对传播与行为改变进行一些探讨。当然，我不会偏离我已经一再强调的分析的结构。行为改变的研究领域有聚焦于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的趋势，比如节省能源或者减少汽车使用，毫无疑问这些改变是重要的。不过，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也是一种行为改变模式，而且我深切地相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分析人们生活方式行为的视角不能有效地运用到人们的政治行为改变之中。

这一研究的起点就是认为人类行为是非常复杂的，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涉及的理性选择比我们以为的要少。当我们面对公共政策时，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依据三个假设：个人主要是自利的；个人为了自我利益做出有意识到、理性的、逻辑的选择；

个人所做出的是自主选择。如果你接受这种人类行为的观点，那么行为改变最好通过两种途径达成。第一，保证个体有足够的信息做出完全理性的决定，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第二，在某些选择上使用价格信号来传递人们想要或者不想要什么。

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两个方法在发动可持续行为上运作得都不怎么好。为什么呢？什么考虑被遗漏了呢？首先，我们的很多行为并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习惯或者惯例所决定的。第二，我们的决定总是受到心理的、情绪的因素左右，它们使我们没有做出一个纯粹理性的决策判断。第三，人们并不只是被自利所驱动，还被社会和道德规范、价值观和信仰所驱动，会考虑到其他人和自然世界的需要和利益。第四，行为总是受到外部的、结构的因素限制，对于我们可以获得的选择和行为带来很严格的限制。

保罗·斯坦恩（Paul Stern, 2000）是亲环境行为改变研究方面的权威。大概十年前，他发展出了行为的“价值-信仰-规范”（VBN）模式，将其看作是理性选择的可替代模式，之后这个模式成为理解环境行为最有效最强大的框架。下面有一个这个模式的展示。传播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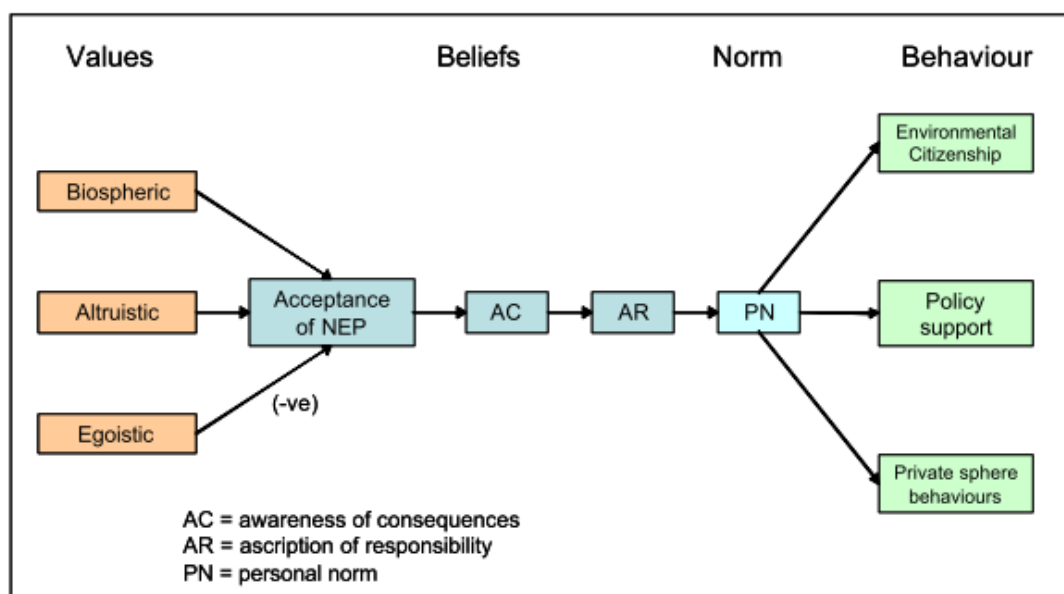


Figure 8: Stern's Value-Belief-Norm Model

我们先来看价值观，这是我这里关注的焦点，因为学界和实践界最近共同认为在环境传播中，它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指的是个体对于什么是对的和错的抱有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跨情境的信仰。价值观是一种道德指南，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的坐标，对于在不同情境中如何行为做出决定，并指导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它们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境下在对与错之间做出抉择。

近来，在政治传播领域，乔治·雷科夫（George Lakoff, 2008）、德鲁·韦斯腾（Drew Westen, 2007）和其他学者提出，最有效和打动人的传播并不来自提供事实、数据或者理性观点，相反，是介入到人们的价值层面。那些在广告和公共关系领域工作的人早就知道这点，但是很多环境宣传者和科学家才开始认识到。

关于价值观，我这里有几点要讲。

第一，从价值观入手可以让我们直接切入个体所在意的核心信仰，这些信仰对他们非常重要，他们投入情绪其中，与他们产生共鸣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方式。它还能够将演讲者与受众放到相似的位置上去，因为他或她分享他们的价值观，因此得以分享生活中对他们重要的东西的理解。我们与和我们有相似思考的人共情，并信任他们。确立一种信任关系是有效

传播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和企业花那么多时间努力说服我们相信, 他们和我们分享相同的价值观。

第二, 从环境行为的视角来看, 一些价值观比另外一些更有帮助。在这个领域工作, 我们常常要清晰地分辨出三种核心价值观: 1、利己主义价值观(它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放在首要位置); 2、利他主义价值观(它对其他人的福祉投注更大的考虑); 3、生物圈价值观, 它强调自然环境的美好。个体的价值观与其环境行为(是否支持更为积极的气候政策, 或者采取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利己主义或者更注重自我利益的个体(与社会)不太关心环境损害和危机, 也不太会为了减少这种危机改变他们的行为。

总结这一领域的研究, 世界自然基金组织最近的一个报告注意到, 那些关注个人金钱上成功的人首先总是“低共情, 更多操控倾向、更倾向于社会不公平与等级, 对不同的人怀有更大的偏见, 不考虑环境问题”(Crompton 2010: 10)。相反, 怀有利他主义和生物圈价值观的个体(与社会)更愿意考虑所谓“比自己更大”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或者全球贫困)。他们更可能改变自己的行为, 回应那些问题, 并为了解决那些问题而进行政治参与。

大概说来, 文化、传播与媒介对于既定社会的价值观有着很重大的影响。例如消费者文化就倾向于以利他主义和生物圈价值观为代价, 将利己主义价值观正常化并促进其发展。

然而, 价值观领地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不是同质的。相反, 这些领地是不同群体和机构之间不同斗争的场域, 它们都想让一种价值观放在另一些价值观前面。我们在既定情境下使用的价值观往往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我们所置身的特定文化和传播环境。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总是自私或者无私。相反, 利己主义、生物圈和利他主义价值观在我们之中共存。在特定时间里, 哪个价值观占主导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比如说, 一些特定的传播运动会激活不同的价值观。例如, 强调特定行为或者特定政策的个体收益, 会激活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果你让一个人节约能源, 因为这可以为他们省钱, 那你同时也在告诉他们, 他们首要考虑的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出行为选择。相反, 如果一个环境运动培养人们与他人共情, 强调同情、共情或者社会正义的主题, 那么就会带来利他主义或生物圈的价值观取向。在气候变化政策的报道框架中, 强调社会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 就能够鼓励人们在决定是否支持某个特定政策时, 考虑其他人的福祉。为什么要少用能源? 因为这可以帮到(或者避免伤害)更多人。

很显然, 单一环境运动只会有有限的影响, 但是持续强调利己主义或者利他主义价值观产生的积累效应就会非常重要了, 因为它会塑造公共话语, 影响人们对政治议题的判断。依靠利己主义框架, 保守派政治意识形态的利己、个人自由的和个体化得以常态化并加强。不过, 通过突显公平或平等的主题, 我们持续不断发出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呼吁, 这能打开人们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设想集体行动时的新文化与政治空间。

“共同事业”的报告(*The Common Cause*)就很清晰地说明了这点, 该报告认为环境传播者需要更持续地唤起它所谓“我们的共同利益”的“深度框架”, 以提高利他主义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化和政治话语中出现。汤姆·克洛普敦(Tom Crompton)是该报告的作者, 他将共同利益框架的基本原则描述为: “人们持续地关注自身及其他, 包括其他人和其他生物”。贪婪与利己不会战胜所有的价值。人类不是自然的自私物种, 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强的合作、同情、友善和慷慨的自然倾向。我们的每日生活都充满了各种案例和实践, 我们常常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去安慰别人, 我们不仅帮助自己家庭的人, 社区的人, 还帮助我们素昧平生的人。“人们对他人施加的价值不能仅仅以经济术语去衡量。人、其他生物以及自然有着自有的价值, 这价值不受经济价值的束缚, 他们‘自己’就是有价值的。”经济理性不是唯一甚至不必然是我们思考什么对我们是有价值的主要方式。还有很多很广泛的其他价值, 比如友谊、道德、共同体、爱、宗教、文化传统等等都在我们思考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事实上, 大多数人都很强烈地感觉到, 为了自己的生活, 让其他人、其

他生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付出代价是非常不道德的。“人们认识到这点，并常常在没有获得任何物质好处的前提下为别人的利益做事。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对可以提高其他人利益的能源和资源项目上投资”（2010：48）历史的和当代的政治都教导我们，最强有力的动员是超越了对物质利己的计算，在道德和精神层面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充满了鼓舞，或者可能对某种不公平充满愤怒。

这里所强调的价值观与一些环境保护运动者和科学家的设想与实践有违，他们相信说服人们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事实与数字，让大量细节描述危机，让人们认识到其严重性。这被称为传播的“信息亏空”模式。它假设要让人们理解并对环境危机采取行动，唯一必要的是更多的信息。而最好的（最道德的）呈现信息的方法就是以客观中立、没有价值倾向的方式让事实“自己说话”。但是问题是，人们并不会客观地、不偏不倚地、不带价值判断地对待“事实”，尤其是关于环境危机的事实。我早前指出过，对疑惑的培养已经将气候变化变为了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当事实挑战了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时，我们会忽略或者忽视它们。正如乔治·雷克夫（George Lakoff）所说，这些问题从我们身上弹开。心理学家将此描述为“动机推论”（motivated reasoning）或“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1982）在风险的文化理论中注意到并描述过这个倾向。有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人对环境危机更怀疑，更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接受这些环境危机会要求他们接受政府对商业进行更高水平的管制和控制，以及限制消费者选择。相反，那些带有平权主义世界观的人更愿意接受这些环境危机，因为他们要求政府发挥更积极的角色，管制经济，对大企业权力进行限制。“共同事业”的报告里认为，如果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和接受高度依赖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那些主导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机构的价值观），那么可能环境运动需要少花点的时间去沟通事实，花大量的时间去培养和提倡那些让人们以积极的、建设的方式参与事实的价值观。

关于价值观的最后一点。在我们的选择和推理过程中，哪些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空间可以被利他主义价值观塑造？在哪些方面我们会更容易想到其他人的福祉？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空间中）之中，人们被启迪，同时也被迫超越自己的利益去思考公共利益。在这里，与对他人的对话与辩论要求我们采取更加开放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推理形式，将其他人的观点、视角和利益纳入思考。相反，利己主义价值观呢？我们在什么地方会最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去考虑？是在消费领域。在这里，经销商和广告商每年花上万亿美元，努力确保我们只考虑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么思考时，我们是最好的消费者。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哪里做出关于环境议题的决定呢？我们在哪里更能做出对环境负责任的决定呢？是在公共领域，在这里推动这些决定的价值观更可能被激活。消费者文化，从另一个方面说，是做出好的环境决定最糟糕的场域。这就意味着，要提高我们的决定水平，最重要的方式是改变做出决定的场域，尤其是让我们在公共领域之中作为一个公民对消费主义做出更多的选择。

VBN 模式的另一个方面是价值观与信仰的关系。根据斯特恩的研究，我们所持有的价值观，或者说我们在某个特定情境倾向的价值观，影响着个体采用“新环境范式”一系列信仰的程度。“新环境范式”（NEP）在1970年代后期由研究者提出，他们注意到在有些人那里，不断增长的环境意识正凝聚成一个相对连贯的信仰体系。这个范式与所谓“主流社会范式”不同。“主流社会范式”是一个更为传统的信仰体系，认为价值存在于经济发展和物质消费中，并主要将自然看作是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一种资源。为衡量一个个体是否采用了“新环境范式”，研究者们发展出了12个观点：我们正在达到地球足以支持的人口极限；自然平衡非常脆弱且容易被打破；人类有权改造自然环境，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人类被创造出来统领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当人类干预自然时，往往会产生灾难性后果；植物与动物主要是为了被人类使用而存在；要维持健康的经济，我们要发展坚实的国家经济，控制工业增长；

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处以求生存；地球就像一个宇宙飞船，只提供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人类不需要适应自然环境，因为他们可以重新改造它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增长有极限，超越了这个极限我们的工业社会无法扩大；人类严重地错待了自然。毫不惊讶地说，采用利他主义和生物圈价值观的人更愿意采用这一系列的环境信仰，而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持有者更倾向于采用主流社会范式。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模式的中间部分：后果认知，责任归属和个人规范。斯特恩发现，“新环境范式”广泛的环境信仰与每个个体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决定对环境带来的后果有非常肯定的关联。相应的，提高环境认知也可能增加个人的责任意识，避免或者降低带来负面效果的行为，参与到有正面效果的行动之中。如果我们的传播体系的确提供了关于我们的行为后果的信息，个体就更愿意对这些行动负责，不管这些行动是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最后，这种意识与责任的结合激发了个人规范，带来强烈的道德规范感，在特定的情景中以特定的方式行动。

这个模式的中间部分与我早前所讨论的消费者文化非常契合。消费者文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一起有效地在后果意识阶段阻碍运动进程。不管是市场还是消费者文化都没有提供很多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给我们周围的世界带来了什么。这意味着尽管人们在价值观和信仰上可能有牢固的基础从事与环境亲善的行为，但我们从来不了解行动的结尾部分，因为这个链条在后果意识这里被打破了。换句话说，结构性阻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媒体系统运作带来的后果。

最后，我们看看可持续行为，这既包括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行为。这引向我的最后一点，关于传播和行为改变的关系。有的模式主要聚焦个体因素，认为它们塑造了环境行为，这样的模式基本上是不完整的，因为外部的或者结构的因素往往是确立或限制某种行为形式的单一、最大因素。在亲环境保护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态度-行为”鸿沟。我们现在来到了链条的末尾，我们有“新环境范式”正确的价值观、信仰，理解我们行为的后果并对此负责，然后我们发现根本没有大众传输体系、可再生能源或者有机的、本地生产的食物。这样一来，所有让我们来到这一点的“工作”都有效的丢失了，因为根本没有外部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在概念化这种模式时，只谈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谈及如何发动政治行为，要求基础设施和外部支持，这对于保证可持续的行为至关重要。这里的底线是改变我们的政治行为，让人们在社会和环境正义的运动中积极起来，被发动起来，这远远更为重要、有效，比以消费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改变更能赋权。

结论：中国和环境传播政治

在这里我将谈及我对中国和环境传播的几点思考。我对中国的环境传播知之甚少。不过我想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在与西方的气候变化讨论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符号、话语和意识形态角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西方环境话语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符号意义。

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而且中国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扩大经济增长，这两点合在一起，让我们对为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全球减排水平能否达到感到疑虑。我在对加拿大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的观察中，发现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我们不要对气候变化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减少加拿大排放量对比中国快速增长的排放量来说不值一提。当他们（中国人）不减少他们的排放量时，我们干嘛要限制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1997年美国参议院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他们拒绝批准任何气候条约，只要不是要所有国家减排。作为一种保守派的修辞策略，我认为这种推理比环境抵赖框架更为有效。首先，它不是建立在排斥科学的基础之上。其次，它将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责任从自己推

到别人头上。第三, 它挪用了平等和公平的语言, 将西方(以及世界)与具有经济发展野心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置于敌对的位置。第四, 它看起来很实用也很实际, 扬扬鼓吹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即如果全球排放不减少, 任何国家(或国家群)的行动都是无关紧要的。

虽然很容易就可以指出这个观点中的重大漏洞(根本还不需要谈及历史责任和能力的原则问题), 但是却不能减损其功效, 无法说服北美不要推迟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而且整个观点的基石就是将中国再现为一个死不悔改的污染者, 最好的代表性符号形象就是到处散布说, 这个国家每周都会建起两个新的燃煤发电厂。而这个事实中更大的一个部分却不被提及, 那就是这些工业发展是为了满足西方消费者对廉价商品的巨大需求。对中国的中伤在哥本哈根之后更加强化, 一些政客和环境保护者将中国政府说成是阻碍全球碳排放进程最主要的责任人。

另一方面,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大众交通方面投资巨大, 这被标榜为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证据, 说明中国不仅在减少排放方面做着自己的工作, 而且还领导着新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在这个叙事中, 中国代表着希望与进步, 政府在减少碳排放的基础设施和发展科技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而且, 这个主题还和全球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视角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这个定位对其他没有在绿色经济上进行类似投资的国家代表着警示。不像中国这样在绿色经济上投资, 你们将失去这一经济必然会产生巨大利润。

中国在例如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辆的制造方面地位崛起, 这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很多关注。伴随着这些报道的还有中国在气候变化很容易受到影响, 要么是海平面上升, 要么是干旱或者洪水, 中国政府看上去一点也不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远见。温哥华市长格雷戈·罗伯逊最近访问了上海, 他回国后引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 因为他赞美中国在这方面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令人瞩目的行动”。

中国是被放入英雄的框架还是恶徒的框架, 在西方的环境话语政治中, 这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可能不仅在引导公众对气候政策的胃口更加积极, 并且在决定气候变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问题方面, 而且是一个人类力量可以集体解决的问题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Maxwell, Boykoff and Jules, Boykoff. Balance as bias: global warming and the US prestige pr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4(14): 125~136.

Cox, Robert. 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 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07 (May): 5~20.

Crompton, Tom. *Common Cause: The Case for Working with our Cultural Values*. WWF-UK, 2010.

De Luca, Kevin.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9.

Diamond, Jare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Viking, 2005.

Douglas, Mary.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Ewen, Stuart. *All Consuming Images: The Politics of Styl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Ewen, Stuart.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Fischer, Douglas. 2010 in Review: The year climate coverage “fell off the map”. *The Daily Climate*, 2011-01-03. Accessed from www.dailyclimate.org/tdc-newsroom/2011/01/climate-coverage.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Gunster, Shane (forthcoming). *Covering Copenhagen: Climate Change in BC Medi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ackson, Tim. *Motivat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Network, 2005.

Jameson, Fredric. *Future City*. *New Left Review* 21, 2003(May-June). Jamieson, Kathleen Hall and Joseph Capella. *Echo Chamber: Rush Limbaugh and the Conservative Media Establish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Jhally, Sut.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Consumer Society*. London: Pinter, 1987.

Lakoff, George. *The Political Mind: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21st Century Politics with an 18th Century Brain*. New York: Viking, 2008.

LeBow, Victor. *Price Competition in 1955*.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5: 5~10, 42, 44.

Maniates, Michael. *Individualization: Plant a Tree, Buy a Bike, Save the World?*.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1(1: 3): 31~52.

Meadows, Donella H.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Oreskes, Naomi and Erik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0.

PEW Research Center.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10*. Accessed from <http://features.journalism.org/year-in-the-news>.

Rees, Bill. *Is Humanity Inherently Unsustainable?*. *Citizen Action Monitor*, 2010 (6).

Smythe, Dallas.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 (Fall): 1~27.

Speth, James Gustav. *The 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The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tern, Paul.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ur. *Journal of Social*, 2000 (Issues 36: 3): 407~424.

Westen, Drew. *The Political Brain: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Wright, Ronald.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2004.

全球传播研究

中国与印度——合作系统化升级的案例

China and India - The case for systematic escalation of cooperation^①

(澳) 奈仁·奇蒂^②

董乐铄^③

摘要:中国与印度是具有历史渊源的毗邻文明之邦，两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有人口，商品以及思想的交流。两国在价值观和文化的一些重要方面对彼此存在着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在历史上，两国也产生过边境纠纷，并且曾陷入战争。在二十一世纪，两国的庞大的人口数量促使他们进入了初级超级大国状态。近期的研究表明，虽然中印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并不是高级阶段的。现实冲突理论告诉我们，处于竞争中的双方会对彼此产生相对敌对的形象。把对方看作敌人的感知会最大限度的增加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合作中产生的正面互惠的形象会促进合作的发展，并且把合作扩大到更多的领域。本文提倡，中印两国应该在一个联合委员会的指导下系统性

^① 本文的第一版曾作为2010年4月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印度与中国：公共外交，增加理解”大会的主题发言稿；第二版曾作为2011年4月18日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举办的午餐沙龙演讲稿。本文作者感谢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媒体、音乐、传播与文化系的博士生纪莉同学为本文所做出的贡献。

^② 奈仁·奇蒂 (Naren Chitty)，教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国际传播学系创始人，软实力推广与研究中心主任。本刊第三辑曾将该作者名翻译为“内忍·奇蒂”，因不太准确，所以本辑改用奈仁·奇蒂的译名。

^③ 董乐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的扩大合作，在这种规划下的合作可以被设想为是两国软实力空间的生成，这种软实力空间是基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文化和历史所产生的相互吸引力。

关键词：中国，合作，和谐，形象，印度，公共外交，软实力，价值观

Abstract: India and China are neighboring civilizations of ancient lineage that have exchanged people, goods and ideas over time. They have entertained a mutual attraction for each other in terms of important aspects of values and culture. They have also quarreled about their borders and engaged in war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their long history of proximity. In the 21st C their huge populations have propelled them to incipient superpower status.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ile there i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is not of a high order. 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 informs us of the propensity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ontending parties to generating reciprocal enemy imagery. The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as an enemy can increase measures to maximize security thus further escalating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motion of positive reciprocal imagery generated through cooperation will encourage such cooperation to spill-over into widening circles of activity. This essay advocates a systematic expans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joint commission. Cooperation under this scheme could be conceived of as the generation of a soft power space for the two countries – based on their mutual attraction derived from shared values, culture and history.

Key words: China, Cooperation, Harmony, Image, India,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Values

中国与印度是强大的邻国, 有着充满着和平共处与边境冲突的多变历史。几乎占据着全世界 40% 的人口总量, 他们的合作, 冲突, 发展和沟通能够很容易的主宰周边一些较小的国家甚至全世界的安全考量, 同时也主导了研究领域的议程。本文认为, 一个全新的亚洲国际传播应该非常关注中印之间的信息流通, 在外部, 即中印之间, 以一个东-西的维度或者政治价值观鸿沟的视角研究; 在内部, 即中印共同存在的问题, 如贫富差距, 以一个内部的南-北纬度或者发展鸿沟的视角观察。^①中印两国拥有购买力的人口, 他们迅速增长的实力和财富, 他们的核能力, 他们对于资源和客户的竞争, 以及他们的边境纠纷, 使得中印关系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 新的地缘政治要求我们思索如何最小化中印冲突的可能性。本文正是以此为目的, 从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出发, 探讨这种减少冲突风险的可能性。本文将首先介绍传统视角中的中印关系。然后进行理论探讨, 接下来分析亚洲的基本价值观, 最后, 本文提出一种中印两国的特殊合作路线。

近二十年前, 本文作者之一奈仁·奇蒂教授在印度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南亚转型的框架研究》。^②这本书的主题是, 在把印度次大陆重新概念化为市场的过程中, 旧的权力与冲突结构可能发生转型。这本书在出版时被归纳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的范畴, 今天, 我们仍然站在国际传播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用国际传播的视角来审视和中印关系, 我们发现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印和巴西、俄罗斯以及南非同被视为“金砖五国”(BRICS), 并且被认为在 2050 年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在“金砖五国”中,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重要角色。尽管“金砖五国”是中印合作的一个平台, 国际安全的分析专家认为两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不容乐观。因此, 思考如何使用国际传播的视角来进一步激活两国关系具有非凡的意义。

在国家安全方面, 1993 年 9 月和 1996 年 11 月, 中国与印度先后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贸易方面, 2011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超出了预计的 600 亿美元目标。印度对于中国的机械设备的需求近 200 亿美元, 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原材料, 比如铁矿石和棉花, 也达到了 200 亿美元。而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依旧担心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③安全分析师麦德卡夫发现, 中印双方的外交合作非常有限, 包括参与双方的国际论坛, 比如中国的上海合作组织, 有限的军事合作, 包括边境工作委员会安全/战略对话(2000), 国防对话(2007, 2008, 2010), 联合军事演习(2007, 2008, 2011)以及港口停靠。在地缘政治的层面, 他提到, 中印两国之间的重要议题是两国之间对于能源的竞争, 以及双方未解决的领土争端。^④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是印度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麦德卡夫同时也指出, 两国之间几乎没有软实力的合作。^⑤其他分析师在关于中印关系的考虑中走得更远。有研究报告称: “在过去的几年中,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相怀疑在不断增加, 这是很危险的”, 并且“新德里在 2008 年引进了一个新的学说, 来为一场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战争做准备”。^⑥注意到中国和印度在海事问题上的战略不信任, 汤恩森德建议两国应该“寻求建立一种相互

^① Naren Chitty. Mapping Asi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0 (20: 2): 181~196.

^② Naren Chitty. Framing South Asian Transformation. South Asian Publishers, 1994.

^③ The Hindu. India-China trade surpasses target. 2011-01-27.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article1129785.ece>.

^④ Rory Medcalf in a talk entitled “Unravelling Rivalry: China and India” delivered at the Lowy Foundation in Sydney on 4 May 2011.

^⑤ Peter Hartcher. Best pals pact puts wind up the world.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1-05-25.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s/best-pals-pact-puts-wind-up-the-world-20110523-1f0qc.html>.

^⑥ Peter Hartcher. Best pals pact puts wind up the world.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1-05-25.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s/best-pals-pact-puts-wind-up-the-world-20110523-1f0qc.html>.

的信任,通过更好的利用合作机会和共担责任”。^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认为,虽然“中印之间存在着相异的地理战略利益和领土争端……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共同面对西方对于减少碳排放所施加的压力,这使两国走得更近”。^②

2010年4月,为了纪念中印建交60周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印度与中国:公共外交,增加理解”大会。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梅农表示,印度和中国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领土问题,但是印度不会让这些问题阻碍其他领域的合作。中国驻印度大使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在这个会议上,印度外交部的公共外交专家表示,他的主要公共外交任务是矫正印度青年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这种负面印象主要是产生于印度电视的影响。由于对中国存在敌意,印度中产阶级青年被看作是煽动印度对中国态度更加强硬的代表。印度政府官员解释说,完全独立的印度媒体,通常会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处理新闻,这也是之所以导致印度青年被误导的原因。

今天,新德里被认为是对于中印关系有着成熟的态度。印度的外交部长提到,印度工人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被中国军队威胁,这样的媒体报道是“无根据”的。^③印度评论家谈到,印度长期受到中国媒体的嘲笑。^④然而,当本文作者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午餐沙龙谈及这个问题时,中国青年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失望。据观察,他们普遍对于印度有正面的看法。^⑤

以上讨论显示,尽管双方有培育良好关系的诚意以及有合作以及扩展合作的愿望,中印目前的合作仍然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并且有望通过系统的扩展给双方带来更大利益。以下将探讨在理论背景下如何寻求更高平台的合作。

国际传播理论探讨

国际传播是源自西方的研究领域,而并不是一个学科。西方对说服的研究,以及对于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观察催生了国际传播这个领域。该领域集纳了国际关系,媒体传播,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和领域的知识,关注信息,文本,话语,内容,信息传播技术,受众与接收,以及国际行为体,媒介和传播在国家权力中的角色。国际传播学产生于后1939—1945时代,创建者汲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期间的宣传研究,如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宣传的“阴暗面”研究和丹尼尔·勒纳的现代化的“光明面”研究。在冷战之后越来越被重视的公共外交研究中,国际传播更把这些研究成果发扬光大^⑥从东方集团(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关系)到南方世界(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南-北关系),我们注意到这些地缘政治正在被以政治传播和说服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

^① Ashley Townshend. *Sino-Indian Maritime Relations: Managing mistrust in the Indian Ocean*. Lowy Institute, Sydney, 2010.

^②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2011 (March/April): 68~79.

^③ Reuters. India: A billion aspirations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n politics: Does the Indian media overplay Indo-Chinese tension?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blogs.reuters.com/india/2011/01/11/does-the-indian-media-overplay-indo-chinese-tension>.

^④ Bhaskar Roy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3431: The India-China Media War.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5Cpapers35%5Cpaper3431.html>.

^⑤ A “Sino-phobia has marked much of India's politics ever since” the Sino-Indian disputes of the Sixties. “The general acceptability of ... anti-China rhetoric is high in India because of the scar that the 1962 conflict left on the popular psyche and its perpetration through the most powerful popular medium, cinema. The ordinary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barely know, or care, about 1962. Most Chinese are not even aware of the conflict. And the handful of those who are, know it as a border “skirmish”, not “war”, for which neither India nor China was responsible. Instead, they have been taught to see it as a legacy of the machinations of imperial powers. India-bashing thus doesn't sell in China, nor are there any visible traces of it in its political or cultural spheres. If the Chinese have anything for India, it's sheer fascination”. Debashish Roy Chowdhury Jan 19, 2008. “China's Bollywood love affair”. *Asia Times Online*. Retrieved February 2, 2010, from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JA19Ad01.html>.

^⑥ Naren Chitty, 2010. Op. cit.

提出亚洲国际传播的概念, 本文注意到地缘政治的聚焦向中国和印度的转移, 使东-西维度显得更清楚。中印两国共享悠久的历史文化, 科技与智慧, 但是却有着不同的民主制度。本文提倡关心亚洲国际传播的研究者关注以下两个重要议题: (1) 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产生的一个全新的东-西国际传播关系; (2) 在中国和印度两国内部各自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 也就是国际传播视角中的南-北问题。^①

本文特别强调国际传播的对话取向中的形象与合作的理论。^②在肯尼斯·鲍尔丁的三角系统中, 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形象: 经济、军事和社区参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交换或利己, 威胁或消极互惠以及一体化或合作。鲍尔丁进一步指出“一体化是指在威胁和生产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之间建立社区”。^③马瑟夫·谢里夫的现实冲突理论, 为本文所论证的形象与合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 即合作以达到一个高级目标会使竞争的双方对彼此产生正面的形象, 而冲突会促使外围集团负面形象的形成。^④

一些国际关系学者隐含的或明确的进入了国际传播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关注国家权力, 主导范式是现实主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波顿, 他所引入的现实主义主要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人类社会可以通过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期待建立和平与合作的状态。^⑤尼古拉斯·欧那夫引入建构主义理论——社会建构世界政治。功能主义者^⑥和新功能主义者都对起因于特定领域合作的国际一体化有所论述。非常重要的一项是约瑟夫·奈教授关于软实力和巧实力的概念。^⑦尽管是从国际关系的领域中提出, 以上的概念也经常用来解释国际传播中的问题。奈超越了拉斯韦尔^⑧关于影响是建立在吸引的基础上的见解。吸引的力量是一个与马基雅维利共鸣的概念。马基雅维利对于君主的建议是: “避免被轻视和被憎恨”, 以及“君主应该把那些会引起谴责的管理事务留给他人, 而自己保持慈悲, 并且珍视贵族, 但是不能使他自己被人民憎恨”。^⑨软实力包括吸引力资源, 比如: 文化(农业, 艺术, 电影, 节日, 文学, 音乐, 体育), 教育, 生活方式, 场所(城市, 遗迹, 博物, 野生公园), 价值观(如孔子观)等。

把软实力置于公共外交的范围之内, 本文认为, 公共外交可分为硬实力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公共外交。硬实力公共外交通常是一种国际实体通过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努力。软实力公共外交利用一个国家的品牌价值和文化传播与交换, 媒体, 学术和灾难援助为资源。本文认为, 对移民开放的国家, 软实力可以通过移民数据测量。2005年, 前十位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分别是: 美国, 俄罗斯, 德国, 法国, 沙特阿拉伯, 印度英国, 西班牙和澳大利亚。^⑩这个列表中存在的国家可能被一些人青睐, 而被另一些人回避。对于有些国家来说, 可能存在一种“全球性软实力”, 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有吸引力。但是, 可能某一个维度是有吸引力的, 比如生活方式和文化, 另一个维度可能并不是, 比如对外政策。第二个衡量软实力的维

^① Naren Chitty, 2010. Op. cit.

^②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1981), 1991; C. Botan. *Ethics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The Case for a New Approach to Public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1997 (34:2): 188~202.

^③ Kenneth Boulding.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④ Muzafer Sherif, O. J. Harvey, B. Jack White, William R. Hood, Carolyn W. Sherif (1954/1961).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⑤ John Weir Burt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eneral theory*, 1965.

^⑥ David Mitrany.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⑦ Joseph Nye. *The origins of "Smart Power"*. *Foreign Policy*. 2009-01-14.

^⑧ Harold Lasswell.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1935.

^⑨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W. K. Marriot. Tr.], 1515.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ebooks.adelaide.edu.au/m/machiavelli/niccolo/m149p/>.

^⑩ The list changes when one looks at the top ten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share of migration in their total population, to UAE, Kuwait, Singapore, Israel, Jordan, Saudi Arabia, Oman, Switzerland, Australia and Canada.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PI Data Hub. Retrieved May 27, 2011, from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datahub/>.

度是旅游业。在这个维度中, 中国位居第三, 仅在法国和美国之后。^①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也给我们提供了从健康(出生时预期寿命), 教育(平均学校教育年数和预计学校教育年数)和生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给如何看待与健康与生存有关的吸引力提供了另一种方式。^②其他软实力的维度是和统治和文化相联系的。

考虑软实力对于一个社会的质性影响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国际信息量而从量的角度扩张软实力。但是, 除非软实力的质量在扩张过程中得到明显提升, 这种传达的信息仍然可能是尖声刺耳的。那么, 什么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品质的一般维度?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道德软实力包含四种装扮——三个是, 一个不。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观的整合是中国软实力在世界传播的基本“装扮”(或建构)。“装扮”作为你所建立的最高的文化观念——中国的软实力与儒家思想琴瑟和鸣。一个国家可以加强它的吸引力以及具备吸引力的特点。这是对于“装扮”的合法性使用(化妆), 强调突出魅力或者强调吸引力。也就是, 打扮作为化妆品——例如: 改进吸引力。第三种是: 打扮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法。第四种“装扮”(或发明)是打扮作为弄虚作假, 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因为人为的创造会迅速被发现并导致不信任。^③

硬实力也可以成为吸引力。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不用强制就能吸引相对弱小的国家。同时, 对一方有吸引力的, 对另一方可能是令人反感的。所以,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可能在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传播。中国和印度相互吸引因为他们共享的文化和悠久历史, 现在更因为同为崛起的力量而相互靠近。

亚洲国际传播与新地缘政治

亚洲的基本价值观、政治和社会结构起因于亚洲大陆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最突出的是佛教与基督教, 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印度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和拜火教。这一套价值观是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最初的, 最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亚洲基本价值观的共享与共存体现于著名的16世纪中国小说《西游记》, 这部小说是受到公元7世纪中国唐代高僧玄奘从长安(现在的西安)到印度那烂陀寺去学习佛教的取经之路的启发。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得知, 佛教在中国与道教得到混合, 并且变得中国化, 而和谐是佛教和道教文化中所共有的价值观。

第二套的亚洲价值观包含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经济、文化、政治和源自西方社会理论的社会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传播到亚洲以后, 被亚洲的精英所吸收, 并且在1960年代被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所认可。

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再发现与创新促生了第三套价值观体系。比如, 印度从其古老的哲学和宗教, 以及圣雄甘地的思想, 中国从儒家文化中所提取出来了适用于今天世界的价值观。而圣雄甘地和儒家思想都在各自的层面上推崇软实力。

一个新的亚洲国际传播应该综合利用亚洲的基本思想以及西方基础社会理论。印度和中国的基本思想给亚洲国际传播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例如和谐的思想。正如纳卡穆拉所说, 和谐几乎是东方最本质的传统价值观, 并且, 和谐或和睦是一种伦理道德的价值观, 佛教哲学中的“中观”的概念也有所暗示。^④这也是印度教的中心思想, 通过这个概念, 印

^① China world's third most visited country. The Independent.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www.independent.co.uk/travel/news-and-advice/china-worlds-third-most-visited-country-un-2195263.html>.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N.d.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hdi/>.

^③ Naren Chitty. Hard elements of soft power. 2010-11-19. Retrieved May 26, 2011, from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0-11/19/content_11574979.htm.

^④ H. Nakamura. The significance of 'harmony' in Buddhist thought. — n.d. Retrieved August 15, 2009, from <http://74.125.153.132/search?q=cache:0AhOprWp6aoJ:sunzi1.lib.hku.hk/hkjo/view/35/3500144.pdf+harmony+in+buddhism&cd=15&hl=en&ct=clnk&gl=au&client=firefox-a>.

度教找到了通向真理的多条道路^①。同时,“伊斯兰教宣扬社会的整体和谐,包括全世界都需要的宗教和谐”。^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和”事实上是一种对话的关系。和谐的概念源自于音乐,特指一种声音对于另一种声音的回应与共鸣,双方是平等的,但是是不同的——这给创新留下了空间,“君子和而不同”^③。这里,和谐强调的是差异的共存。

和谐的微观政治学可以在佛教和儒家文化中找到依据。佛教的论证是经验的和辩证的,强调接收者的感知,而不是传输的过程或者利用环境构建和谐^④。在中国积极推广和谐的概念之前,和谐的维度也体现在发展传播中的参与的理念中。发展传播这个术语被认为是由菲律宾学者诺拉·奎巴拉创立,他赞成把参与作为该领域一个值得突出强调的特点^⑤。和谐同样也被看作是双方的“相互教育”,来发展一种给个体赋权的传播方式,并且增加“在自身内部和在社区内部平衡传统与现代”^⑥的能力。

宏观方面,可以在儒家思想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证中找到依据。这也与奈的软实力概念相匹配^⑦。软实力不仅仅是影响,并且有别于强制的影响。查德威克在讨论拉斯韦尔关于影响的观点时,指出了“吸引力影响”的概念^⑧。这个“吸引力影响”的理论路径是寻求系统稳定性,同时和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秩序的强调不谋而合^⑨。

中国当下正在有意识的发展软实力。^⑩中国的软实力常常被和儒家文化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软实力的路径包括利用多重知识和经验来加工,知识包括西方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外交理论,软实力理论以及儒家文化,同时保留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框架¹¹。实际上,软实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组织的力量,被中国社会各界所采用。延展软实力的概念包括扩展其使用的形态,即宏观与微观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把“和谐”作为主要框架,发展自己的国家品牌。“和谐”的框架包括对于多方位的国际秩序的审视和分析,如何走一条“双赢”的道路,以及儒家文化的软实力。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通过越来越熟练的使用公共外交工具,这个软实力包会被传播至亚洲和全世界。另一方面,对于印度来说,印度致力于发展的国家品牌是基于多样性和民主的价值观,如“不可思议的印度”国家宣传口号的提出。同时,印度也越来越严肃的把软实力作为重要理念。然而,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软实力举措都被看作是他们在全球竞争与扩张的行为和野心。这种相互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的,并且使印度和中国的文化自信得到了增强。

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官方表示,虽然中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国可以在一些共同的利益空间中和其他国家达成合作,并且不一定要有共享的价值观。”¹²正是如此,中印之间的特殊软实力联系纽带可以是深深根植于两国悠久文明的道德软实力。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呼吁,建立一个共享的软实力空间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建立中印之间的特殊的关系。

^① Ramakrishna Mission Shivanahalli. Ideology, 2007. Retrieved February 2, 2010, from <http://rkmission-halli.org/Mar07-Release/rkm-intro.html>.

^② M. Ali. Religious harmony in Islam. Islamic Voice, 1998 (12). Retrieved February 2, 2010, from <http://www.islamicvoice.com/december.98/features.htm#REL>.

^③ E. Ryden, Trans. Zhang, D. Key concepts in Chinese philosoph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2.

^④ Wimal Dissanayake (ed.). The need for Asian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AMIC, 1988: 204~210.

^⑤ Nora Quebral.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Solidarity, 1972 (7:6):39~44.

^⑥ Naren Chitty. Development is communication: Self-reliance, self-development and empowerment.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1992 (9:1): 21~42.

^⑦ Joseph Nye. Soft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s Quarterly, 2004 (Summer).

^⑧ R. Chadwick. Lasswell's value theory reconstructed as means, 1999. Retrieved August 15, 2009, from <http://www.hawaii.edu/intrel/pols315/Text/Theory/lasswell.htm>.

^⑨ M.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81.

^⑩ Rawnsley, G. Snow, N. and Taylor, P. (ed.). China talks back: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for the Chinese century.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82~291.

¹¹ Naren Chitty, N. The year of living famously - Lessons from the Beijing Olympic year of 2008, 2009.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 Power and Nation Branding,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¹² Wang Jisi, 2011. Op. cit.

中国和印度：共享空间的提议

本文提出，中国和印度应该创建一个共享的合作空间。我们提议，这个空间应该是一个可靠的和谐空间（Credible Harmony）。在这个空间内，中印具有开展多领域合作的潜在可能性。这样一个空间需要一个中印专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协调和操作。这个联合委员会将积极提出合作意向和项目，并且是这些良好的意愿通过媒体在全球得到广泛传播。

本文倡导，在创建这个可靠的和谐空间时，有四个领域需要特别关注：空间科技的合作，教育合作，健康与扶贫。王缉思指出，在中国，“对于GDP增长的关注已经逐渐被经济效益，产品质量，环境保护，互联网安全以及科技创新所冲淡”^①。在开发设计安全的互联网和扶贫方面的合作会有助于改善被全球化所影响的人们的生活。

电影、音乐以及人口的交流是可靠的和谐空间的另一个方面^②。我们鼓励开展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和中国的各种团体和组织如何看待彼此的文化和社会的研究，这将是对于发展可靠的和谐空间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中印两国的海外离散人团体。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综合国力的日渐强盛，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民族主义和竞争意识也逐渐上升。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对外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③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双方都存在着潜在的强大吸引力。这可能会成为发展可靠的和谐空间的星星之火。无疑，蓬勃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倡导，经济的支持和学术的探讨。我们相信可靠的和谐空间给中国、印度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大众带来的机遇将是不可估量的。本文仅以抛砖引玉之名，希望能给中国和印度学者带来思考与讨论，从而给中印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① Wang Jisi, 2011. Op. cit.

^② Bollywood films are popular in China. Debashish Roy Chowdhury. China's Bollywood love affair. Asia Times Online, 2008-01-19. Retrieved February 2, 2010, from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JA19Ad01.html>.

^③ Ashok Malik. India's new world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Sydney, Lowy Institute, 2011.